温州史志

WENZHOU 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4年第3期
（总第148期）

目录 contents

■ **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03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 曲青山

■ **纪念温独支成立100周年**

09 温独支成员苏中常（苏渊雷）早期革命事迹及历史贡献 许允水 陈忠巢

■ **史志研究**

17 唐温州刺史郑镒考略 朱如明

26 试论提升县级综合年鉴开发利用水平的把控要素 周田田

■ **史海钩沉**

33 寻访革命印记 砥砺红色初心
——林心平烈士足迹寻访记 王 祥

37 林心平烈士日记摘抄 蔡少盾

40 清末泰顺籍学生林宗强的“大学文凭” 陶汉心

44 20世纪80年代乐清民间金融风暴纪实 林丽娜

■ **历史人文**

52 梅溪书院：振仲尼文教之鸣 全定旺

56 金钱会南征始末 胡进士

67 圣井山石殿：一座无砖无瓦无木的石殿 谢公望

目录 contents

■ 红色文物故事

69 一封英雄的家书

72 一张35年不离身的代表证

74 “四战四捷”嘉奖令 功勋永不褪色

■ 革命人物

76 为希望而生为希望而死——陈再华传略

81 热血谱写青春的赞歌——关榕传略

■ 温州宰辅

87 陈宜中

89 黄 淮

91 张 璁

■ 诗意温州

93 永嘉学派薛季宣的江心屿诗情 尤豆豆

■ 强城纪实

98 “强城行动”大事记（第三季度）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封二：图片报道
封三：摄影作品
封底篆刻：蓝潮

温州史志

2024年第3期
（总第148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赖晓华
副主任：陈明敢 何念国 吴 华 魏仕阔 钟体琪 张声和 张致光
委 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厉 靖 陈 好
主 编：赖晓华
执行主编：何念国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李 亮 王仲祥
校 对：杨建明

地址：温州市行政中心1号楼
电话：88968780
传真：88968777
Email：wzds@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4年9月
刊号：浙内资准字第C044号
印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声明：除作者另有声明，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来稿文责自负，因原稿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本刊不负连带责任。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已许可本刊进行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

◇ 曲青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的继续，又是改革在新时代的重新开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在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对改革作出全面战略部署，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改革总目标之明确、内容之全面系统、力度之大、影响之广泛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领导改革工作，主持召开72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统一思想认识、进行工作部署、审议重大改革方案、分析改革形势、推动改革落实，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砥砺前行、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全方位、

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我们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不断改进，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日臻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断强化，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持续显现。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至126.1万亿元；科技自立自强成果持续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截至2023年底，各类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84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突破1.24亿户，发展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共建“一带一路”深入人心、成果丰硕，中欧班列持续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实行，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构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一大国，是近200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通

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我们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步发展。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

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长足进展，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改革，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我们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完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机制，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我们建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后果严惩等生态文明基础性框架，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家安全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国家

安全领域改革，紧紧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化改革。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紧紧围绕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深化改革，坚持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党的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

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文章来源：《求是》2024年第15期）

公益广告



温独支成员苏中常（苏渊雷）早期革命事迹及历史贡献

◇ 许允水 陈忠巢

1924年8月，温州籍共产党员谢文锦受党中央委托回乡宣传马列主义，筹建党团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应运而生。时代浩荡大潮之下，浙江省立第十师范中学学生苏中常（苏渊雷）、蔡雄、朱维之、金家济（金贯真）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引领学潮，投身社会运动，成为浙南学运的中坚力量。在温独支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文特研究青年先锋苏中常早期革命事迹，阐述其对浙南早期革命所作的历史贡献。

一、故乡发蒙，多方求学

苏中常（1908—1995），始名中常，字仲翔，1933年易名渊雷。平阳县江南玉龙口村（今苍南县钱库镇来谊村）人，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列入20世纪温州文化名人。

苏中常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九月廿九（10月23日），6岁发蒙，就读于金乡外祖父徐迪秋家。13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乡高等小学。14岁入平阳南雁荡山会文书院，师从张汉杰学习古典文学。15岁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中学秋季班。五四运动后，新文艺兴起，学友蔡雄最喜与苏中常切磋，后和同学朱维之、金贯真等组织“宏文会”和“血波社”等社会团体，以文会友。曾与蔡雄将所作诗文合刻为《中谷集》。

二、关注国事，投身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温州师生响应号召，纷纷投入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洪流中。平阳金乡小学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活动。1920年，陈式纯、苏中常



后排左一蔡雄，前排中苏中常

等人在金乡成立“反日救国会”，彼时的少年苏中常已经有忧国忧民的情怀。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倡开国民会议，蔡雄和苏中常开始关注国事、投身社会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全国震惊，反帝风潮开始深入人心。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在全国发展新党员时，苏中常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担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从事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从事社会运动期间，他得读《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新社会观》等书籍，爱不释手，“乃随举其义，以与现实相印证”，并在校刊发表了长诗《十月革命之歌》。其间，蔡雄和苏中常每借故外出，从事宣传演讲，校内外以“狂生”目之。

1926年3月18日，北平“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温州学联紧急行动，苏中常和蔡雄等学联负责人奔走呼号，益无暇日。4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间，以浙江学联代表身份赴广州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与蔡雄握手告别：“别矣珍重！行见之归，示我以新曙光也！”会后，参加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亲见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氛围。参访黄花岗，谒七十二烈士墓，回温后作《粤游新记》，盛扬彼中新政。是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温独支活动，任宣传委员。1926年冬，蔡雄和苏中常合编小册子《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中学以后，

苏中常嗜读《庄子》《楚辞》《史记》《汉书》《文选》《世说新语》《维摩诘经》等，养成了广泛阅读文史的兴趣。毕业时，毅然立下研索文史哲学的志愿。

三、囹圄七年，炼狱生活

（一）四一五被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继宁波、杭州后在温州开始“清党”。4月15日，陈仲雷、戴树棠、苏中常正在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开会时遭武装军警逮捕。驻温省防军声称：“奉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密令，指名将陈仲雷等3人逮捕入狱。”当晚，反动派又到温州总工会逮捕了共产党员童伯吹。1983年，苏中常在回忆时说：“戴、陈、我三人当时的公开名义，是国民党永嘉县党部的秘书、工人部长、组织部长，实际上陈是温独支书记，戴是负责各界救国会及国民会议促进会工作，我是负责温州学联工作的，都是温独支的成员。”

5月3日，陈仲雷、戴树棠、苏中常被解往杭州陆军监狱。随后接读蔡雄来信，增强斗争力量。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有云：“可奈离心争一寸，山阳空听笛声愁。天涯几辈同漂泊，岂有生才似此休！”

而温州则形势日变。5月18日，蔡雄在城区小南门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24日深夜，反动派将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蔡雄抬到省立十中操场秘密杀害。瑞安、平阳、乐清等地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亦遭逮捕。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工、农、学各级群众组织被取缔或改组，温州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①]

苏中常视蔡雄为生平第一知己，蔡雄的牺牲使其备受打击。他在狱中写下《伤感之秋》，以“逝波”笔名密寄上海《幻洲》半月刊（潘汉年主编）发表，长歌当哭，重燃起青春奋战的火焰。“……啊，古城里酣梦的人们被血波推醒了，朦胧的睡眼被红光射透了！起来啊，我们要逐争自由的波浪！起来啊，我们要迎接千载一时的晨光！……”

苏中常于1936年5月作《友人蔡雄烈士事状》，歌哭叙议。晚年回忆：“数十年来生平友好，憧憬往来于吾心中而不能一日忘者。惟烈士蔡雄一人而已。”1992年出版文章结集《钵水斋外集》中附有蔡雄遗作《人道篇》。

狱中，苏中常先后经“清党委员会”“特种刑事法庭”审讯，被“判刑”19年。他先后被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和特别反省院监区，但他毫不畏惧，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曾写下“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手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可惜我这略有组织和宣传才能的青年过早地离开人世”的遗言。为了争取获得放风等基本权利，他与难友几次绝食，坚持斗争，还积极投入狱中党组织倡导的读书运动中。②

在狱中数年，他与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等人秘密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经济学大纲》《帝国主义论》等马列著作，并阅读了《社会学导论》《世界革命史》《古代社会》等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书籍，还自修英语，阅读了《罪与罚》《屠场》《马丁·伊登》等原著，翻译了英美诗歌数十首，涉猎佛典、《圣经》《易藏丛书》《相台本五经古注》《章氏丛书》等。运用历史辩证观点，沟通老庄、黑格尔和达尔文等学说，狱中写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五万余言《易学会通》，这些为后来苏中常从事学术研究打下根基。

（二）回忆八二七

据苏中常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地，看得明明白白地，是那天早晨法警们传呼王屏周③同志（永嘉人，曾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出去的情景。屏周同志只穿件汗背心，手里正拿着听筒，身材魁梧有力，两手一摆，把法警们推开好几尺远，终于被捕去杀害了。这天一共牺牲19位同志，甲、乙、丙三监的难友们都被激动怒吼了。国际歌入云天，悲愤的心情迸发出反抗的呼声。我曾经模仿苏俄诗人勃洛克的诗作，写成《十九个》的长诗，哀悼战友的壮烈牺牲。”

1930年8月27日秘密屠杀后，苏中常一连写了好多诗，而其中的一首七律很快在陆军监狱中传了开来：

深 囚

深囚如海一身遥，午夜中心郁怒潮。
矢志直将戈作枕，行吟不数玉为箫。
鸡鸣风雨谁先觉，松耐冰霜独后凋。
一蹶何曾伤骥足，关山前路正迢迢。

（三）狱中与叶天底烈士对话

浙江陆军监狱设有七重大铁门，进第四道大铁门，设有甲、乙、丙三个监区。中共上虞县委书记、浙东暴动总指挥叶天底被关在乙监3笼，同笼的共有12个囚徒（5个军事犯、盗匪犯，7个政治犯）。叶天底、苏中常与中共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关在一起。对于书画艺术的共同爱好，使苏中常

和叶天底成了好朋友，每有空闲，两个人就海阔天空地谈诗谈画谈书法。

（四）特别反省院的绝食斗争

据骆耕漠回忆：“第一次绝食斗争是搞了政治性斗争。时间是一九二九年夏天……”④起因是难友鲍照光患病死亡，因而代表提出：“我们现在要有保障。第一条，凡有病就要出去治疗；第二条，要宣布我们犯了什么罪，否则，我们绝食到底。”斗争取得了胜利，当天傍晚，上百名囚徒为难友举行了追悼会，在几个囚徒讲话之后，苏中常朗诵了他的诗作《不朽的生命》：“……坟头树起一块青石的墓碑，墓碑上写的是不朽战士的姓名。诗人悲不自胜的手把寒花一束，殷勤地献给这个不朽的战士之灵……”⑤

四、抗战前后，宣传马哲

1933年6月，刑期执行逾三分之一时，由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太湖水利局长林同庄设法取保苏中常出狱，后苏中常易名苏渊雷。“我漫步在杭州城站公园，伸臂呼吸自由空气，百般追忆，千般思索，心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至友的永别，青春古渡头的过来人……只有与死神较量过的人，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我抖擞精神，向着浩瀚的人海走去。”

出狱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受聘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在沪不久，与先后出狱的同志陆续会齐，参加党的外围工作，参加薛暮桥、骆耕漠等主持的《中国农村》刊物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某些活动。1934年秋，与钱俊瑞、徐雪寒等发起创办新知书店。继赴南京，同千家驹、孙晓村、赖亚力等一起，参加救国会、求知合作社和新兴社会科学座谈会等活动。1937年下半年在南京危城，接编沈钧儒为社长的《抗敌周报》，直至最后一期。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武汉、衡阳、重庆等地，从事抗战后勤工作。武汉撤退前夕，曾说服军医署长胡兰生，拨出大批医疗器材、药物交给延安，成立后方陆军医院。其后，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与贺麟、冯友兰分授哲学课。因在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事者所忌，遂去职。1943年在重庆北碚创办“钵水斋”书肆（后移重庆城区上清寺），以文会友，刊行《钵水斋丛书》数种。抗战胜利后返沪，担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兼第一处处长。淮海战役期间，会上力排众议，反对派医护大队分赴蒋军前线参加内战。

1949年5月25日晓色中，苏渊雷在

上海迎来了解放。

五、青年担当，文化翘楚

（一）苏渊雷身上洋溢着革命青年的历史担当

考察早期史料，综观其所思所言所为，苏渊雷始终代表浙南青年的朝气和锐气，其组织和唤醒各界青年主人翁精神，至今令人感佩。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争取主权、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风潮影响到了东海一隅的金乡古镇，作为虚龄12岁的少年，心里植入为爱国而抗争的种子。苏渊雷等有志青年从传统“埋头只读圣贤书”的状态中觉醒，始终关注校园外的革命斗争实践，反对直奉皖系，南方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残暴统治，将个人命运和强国理想深度链接，积极领导和参与学联活动、支持北伐出师、反对国民党右派等等。在狱中坚持斗争、学习和思索，从理想主义到经受残酷锻炼，从些许稚嫩到锤炼筋骨，自觉担负起中华儿女投身斗争的时代使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的时代使命就是持续弘扬时代先锋的锐气、勇气，以小我融入大我，关注民生疾苦，经风雨、见世面，以实干担当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对苏渊雷的成长、革命以及学术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苏渊雷的青少年阶段正值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全新的思维模式非常注重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肯定劳动人民的地位、功劳及价值，很快被部分关怀下层人民利益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并掀起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

自身的经历和榜样的鼓舞使得近代时局下的苏渊雷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革命大潮中。新中国成立以后，苏渊雷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知识分子从学习欧美、日本转而学习苏联，是中国广大人民的选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苏渊雷的史学研究成果多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是“革命党理论”即“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占主流地位之时，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等，形成了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预设。

（三）苏渊雷身上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

苏渊雷从少年求学到温州遇良师

益友，以及入“监狱大学”坚持学习到出狱后始终兢兢业业的经历，为毕生从事文史哲、诗书画以及传道授业解惑打下坚实基础。他在1934年就提出“文化综合论”，针对当时治旧学者动辄讥弹治新文艺者为肤浅、治新文艺者则反讥前者为陈腐的情况，他主张批判地综合中外文化，以建设新文化，强调在综合之前，应当尽量对国学或西学作合理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我所用，是扬弃而不是抛弃，即所谓“没有批判的综合，是机会主义的综合；没有综合的批判，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指出，继承传统文化、吸取外来文化、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与原有文化完全无关的新文化，相反，旧文化是新文化赖以滋生的沃土，文化具有“三性”，即继承性、吸收性和创造性。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启发。

20世纪90年代，他针对新儒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糟粕，但以精华为主，不可妄自菲薄。主张“不必玩弄新名词，儒家这一名称就不错”，不人云亦云。还特别告诫后学，“在治学时，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既要“尽精微”，又要“致广大”（即既要考



苏渊雷纪念馆内景

订详尽，又要做好综合、概括和阐发）。

（四）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展现东瓯及海派名士风流

苏渊雷儒释道贯通，幼承庭训到囹圄奋发后成为文史哲大家，其奋斗精神颇有屈子、东坡遇劫难而振作的名士之风，是温州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纪念苏渊雷，实际上是在纪念一种文化精神，更是在集体缅怀一种大家风范。苏渊雷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鲜明的理想精神，尽管一生历经坎坷，但他高举自己理想的旗帜，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矢志不渝地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理想精神就像是一支火把，照亮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学者革命者兼为翘楚，佛学文史学皆登高峰”。苏渊雷一生具有名士风度、哲人风采、史家风范、诗翁

风骨，是我国一代文史大家。苏渊雷追求真理、忠贞爱国的炽热情怀；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治学精神；不拘一格、不断创造的艺术品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应以此为动力，更好地承担起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温州的历史重任，努力推动温州文化事业更加蓬勃发展、更富生命力，让新时代温州绽放更加独特的文化魅力。

（作者单位：许允水，中共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陈忠巢，中共苍南县委党校）

注释：

①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党史（第一卷）》第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②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陆军监狱的革命斗争》第187页，2023年10月。

③王屏周（1900—1930），永嘉人，曾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

④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

⑤黄仁柯：《陆军监狱》之《苏渊雷篇——诗人在狱中》。

唐温州刺史郑镒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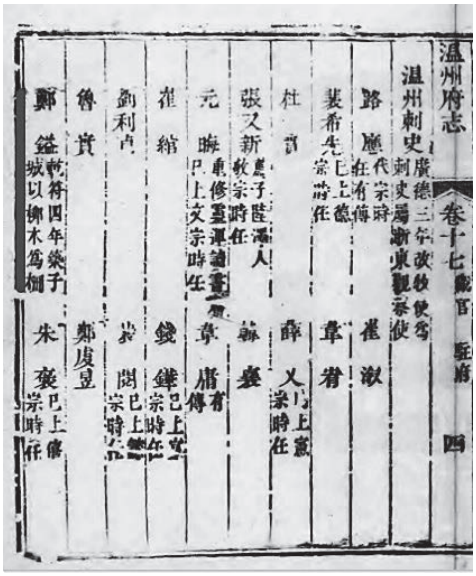
◇ 朱如明

温州郑氏系唐末温州望族之一，以唐温州刺史郑镒为始迁祖。南宋永嘉学派先驱之一的郑伯熊，便是郑镒八世孙。据永嘉《郑氏宗谱》载：“始迁祖郑镒，原居福州，唐乾符三年（876）任永嘉刺史，后退隐不仕，筑室郡城八字桥双井巷。”永嘉塘垮村（古称棠川，现属永嘉县沙头镇）郑氏《重修棠川派宗谱》（清光绪五年，1879）之《叙》云：“我祖自政三镒公任永嘉刺史，遂家焉。”同《谱》记载:“始祖郑永平为温州刺史，世居郡城棠阴里。”永嘉表山《郑氏宗谱·政三镒公墓铭》:“永嘉刺史郑公葬在永嘉孝义乡二十都西山瓯浦之原……公讳镒，字永平……治《春秋》，以进士选乾符元年（874）甲午廷试，中式二十名，对直年策。乙未（875），除文渊阁舍人。三年丙申（876），授永嘉刺史。自下车以来，清正廉能，刚毅果敢，立政令以教民，说伦常以范俗。四年丁酉（877），防巢之乱，以柳木为栅，保障郡邑，军民赖以奠安。为政三年，教化大行。朝廷闻公贤能，称为循吏……上疏乞归田里，恬养于家。适公族侄虔昱亦授永嘉刺史……昱谋于公曰：此郡可以安居，公曰然，遂筑室于郡城之八字桥。”

从相关《郑氏宗谱》大致得到以下几方面的信息：郑镒，福建人，乾符元年（874）进士，乾符二年（875）任文渊阁舍人，乾符三年（876）任温州刺史，乾符四年（877），为防范黄巢之乱，用柳木修建温州子城。在温州任刺史的三年里，政绩斐然。不久辞职，定居于温州郡城。

比钱氏子城还早的修建者

弘治《温州府志·宦职》（卷八）载：“郑镒，乾符四年（877）筑子城，以柳木为栅。”乾隆《温州府志·职官》（卷十七）沿袭旧载。


温州府志 卷十七 職官 四
温州刺史 刺史屬浙東觀察使 廣德二年改防禦使 崔漼
路應 代宗時在任 有傳
裴希先 已上闕 代宗時在任 韋肯
杜言 薛乂 德宗時在任
張又新 襄子陸渾人 敬宗時在任 韓棠
元晦 重修圖經 圖經有傳 已上文宗時在任 韋肯傳
崔綰 錢鍾 宗時年 已上闕
劉利貞 闕 已上闕 宗時在
魯貢 鄭虔豆
鄭鎰 乾符四年築子城以柳木篱栅 朱褒 已上闕 宗時在

（乾隆《温州府志》）

从简略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在梁开平初钱元瓘之前，郑镒已修过子城，可称为“郑氏子城”。郑镒修建的子城还比较粗糙，与其说是子城，还不如说是用柳木围出一圈栅栏，但毕竟已经有了子城的雏形。从时间上推算，“郑氏子城”比后梁开平元年（907）的“钱氏子城”要早30年，或许“钱氏子城”是在“郑氏子城”基础上修建的。

史学界一般以乾符五年（878）为界，之前叫“王仙芝起义”，之后叫“黄巢起义”。乾符二年（875），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起兵，响应王仙芝。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今山东省郓城县），杀节度使薛崇。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兵败被杀，余部奔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称“冲天大将军”。

《郑氏宗谱》中“四年丁酉，防巢之乱……”的“四年丁酉”即877年，正是唐僖宗时的王仙芝起义。《郑氏宗谱》的记述与史实基本一致，但“防巢之乱”不严谨。不过唐末农民起义频发，地方武装割据相互攻伐，导致天下纷乱，为了加强防御，未雨绸缪，增筑子城，是有必要的。

曾任温州刺史

谱牒属于史学的范畴，是我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了史学大厦，这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谱牒中的历史信息，有些时候可以弥补正史、方志之不足，但谱牒记载往往历史跨度较大，子孙后代几经迁徙，一些关于祖先的生平事迹大都通过口口相传重新归集，或几经变迁，散失、断档、重新联谱，致使错漏在所难免，需要与方志、正史互相印

证，找出依据。

《郑氏宗谱》均提及郑镒曾任温州刺史，弘治《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亦有相应的记载，其任职在郑虔昱之后。胡珠生据《郑氏宗谱》和弘治《温州府志·仙释·叶后己传》（卷十四），对郑虔昱专门做了校注，将其位次改在郑镒之后，指出郑虔昱任温州刺史晚郑镒两三年。

乾符二年（875）三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69人立有战功，镇海节度使赵隐却不给衣粮，王郢等人上诉论理无果，于是叛乱，招近万人攻陷苏州、常州，转而剽掠浙东、浙西和福建等地。《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载："（乾符三年，876，九月）王郢因温州刺史鲁寔请降，寔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卷二百五十三）载："乾符四年（877）春，正月，王郢诱寔入舟中，执之，将士从寔者皆奔溃。"

由此可见，乾符三年（876）九月至乾符四年（877）正月，温州刺史还是鲁寔。那么，郑镒于乾符三年（876）任温州刺史没有史实依据，最多也只能是鲁寔的继任者，在乾符四年（877）正月鲁寔被王郢诱执之后。

从《郑氏宗谱》提到的"为政三年"看，郑镒离任至少到广明元年（880）。据《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卷二百五十四）僖宗中和元年（881）载"永嘉贼朱褒陷温州"。另根据沈克成先生编著的《温州历史年表》表述："僖宗中和元年（881）九月，温州人朱褒拥兵占据温州。次年，被委为温州刺史……自中和元年（881）至天复二年（902），朱氏兄弟交替为刺史，占据温州达22年之久。"结合两处记载可以看出，中和元年（881）九月之后，温州实际就已经控制在朱氏兄弟手中，那么郑镒任温州刺史任期，应该是乾符四年（877）二月上任，广明元年（880）至广明二年（881）九月之间离任，不会超过4年。

是文官还是武将

《郑氏宗谱》文中"以进士选乾符元年（874）甲午廷试……三年丙申（876），授永嘉刺史"的表述，是说郑镒中进士第三年就授温州刺史。根据唐朝的官制，正常情况中进

士三年能官至刺史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唐朝考中进士后，不一定授官，即使授官，品阶也不高，一般状元、榜眼，授官为从八品下，如大理评事、诸曹参军、各部考功主事、中县丞、京县尉等，普通进士能授官也是从九品上。而唐朝之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下州刺史皆正四品下。根据《唐代进士录》记载，唐咸通十五年（874，同年十一月改元乾符元年）的进士取额30名，其中包括状元归仁泽在内有姓名记载的共7名，没有找到有关郑镒中进士的记载。这7人中有初任职务记录的4人，分别为县尉、从事、判官、校书郎，级别为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上。所以，按郑氏宗谱的说法，中进士三年即任温州刺史，的确存疑。或许郑镒任温州刺史不是通过科举，而是另有其他特殊途径。

据《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一卷咸通十年（869）记载：“勋初起，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以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可见，在司马光看来，能在咸通九年（868）自带三千人马，自备钱粮军械跟随庞勋起义的郑镒就是土豪。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上·懿宗》：“（懿宗十年，即咸通十年，869，六月）贼将郑镒急攻寿州，诏南面招讨使马举救之，贼解围而去。”

虽然两部史书记录的时间有出入，但史实基本清楚，可以把郑镒起家的时间再前推6年，即咸通九年（868）就跟随庞勋起义。次年即咸通十年（869）五月，徐州营都招讨使康承训率官军进围下邳，庞勋急命郑镒前往救援，但此时郑镒见唐军兵盛，起义军屡败，就率所部降唐。可见，郑镒不是文官，而是参加庞勋起义的武将，其真正的家乡是徐州下邳，而不是《郑氏宗谱》所说的福建。

庞勋起义前后历经一年零两个月，是唐末一次大规模农民反抗斗争，是对唐朝统治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为接踵而至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作铺垫。史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对庞勋起义在唐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中肯评论。庞勋之乱被平定后，庞勋手下将领多人降唐，身份转换为官军将领，皆继续握有兵权，故后来多成为唐末藩镇。与郑镒类似的就有不少。

诸葛爽：原为庞勋叛军部下小校，降唐后，任汝州防御使，累迁夏绥银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黄巢攻陷长安后投降，任命为河阳节度

使。不久复归朝廷，进位检校司徒，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打败魏博节度使韩简。光启二年（886），病死军中。

朱玫：原为庞勋手下镇守沛县的裨将，见庞勋势衰，举城投降，为唐军效力攻打庞勋，后为邠宁节度使，另立襄王为帝，光启二年（886）末被杀。

路审中：原为徐州节度使崔彦曾部下，庞勋攻下徐州后，投了庞勋。唐军攻至徐州城下时，开城向唐军投降。后为杭州刺史，被董昌驱逐，转据鄂州。光启二年（886），为安陆帅周通所攻，遂遁去。

丁从实：庞勋部将，降唐后，唐末为周宝部下常州刺史，镇海军乱，他迎周宝至常州，后为钱镠派杜棱所破，光启三年（887）丁从实奔海陵投杨行密，至广陵被杨行密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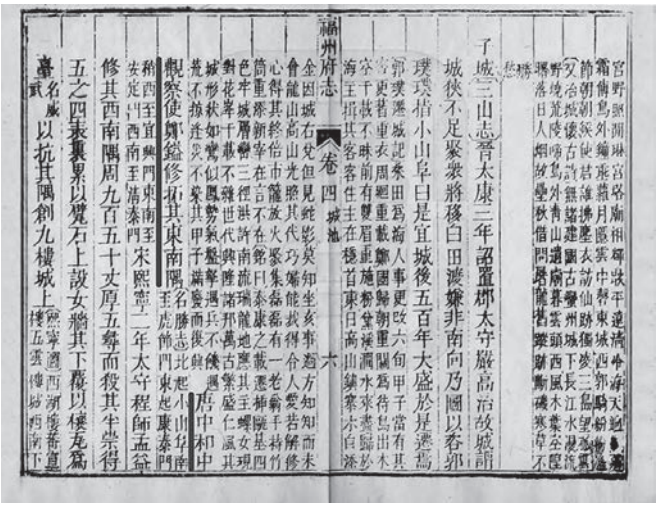
汤群：庞勋部将，降唐后，任岚州刺史时勾结沙陀，调怀州刺史，被郑从谠攻杀。

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下·僖宗》：“（乾符四年，877，三月）以草贼大寇河南、山南，诏曰：‘……近者庞勋拒命，王郢挺灾，结聚至多，猖狂颇甚，寻则身膏原野，家受诛夷。亦有方从叛乱，能自徊翔，移吉凶于反掌之间，变祸福于立谈之际。则诸葛爽今为刺史，朱实见存将军，弘霸郎受职于禁营，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显，家族辉荣……如乡村有干勇才略，而能率合义徒，驱除草寇者，本处以闻，亦与重赏。如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朝廷故不食言。敕到，宜令诸道明行宣谕，令知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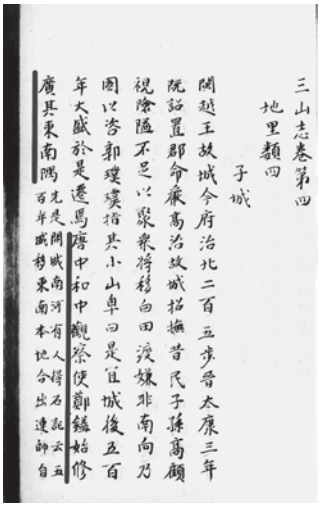
说明当时的唐僖宗对起义和割据，采取以招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诏书列举了对受降后诸葛爽当了刺史，朱实做了将军，弘霸郎在禁军任职，宋再雄在淮海做官，没有一人不是声名光耀显赫，家族辉煌荣宠。各地人才中勇敢干练而富于才略的人能够率领义士们驱除草寇，本地方的官府知道了，也给予重赏。如郑镒、汤群这类人，已经做了刺史，朝廷仍旧不食言。再结合前文，作为鲁寔的继任者，郑镒任温州刺史，官方的认定时间就是乾符四年（877）。

比温州刺史官阶更高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十载：“（唐福州长乐郡中都督府刺史）郑镒，广明初任。”乾隆《福州府志》：“郑镒，广明元年（880）任都



乾隆《福州府志》



淳熙《三山志》

团练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可见郑镒是880年离任温州刺史，与《郑氏宗谱》提到的“为政三年”基本相符。在温州刺史离任后，郑镒并没有直接退隐定居郡城，而是升任为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这应该是他官场最高光的时刻，也属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卷二百五十六）载：“（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初，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一路南下，从浙江江山开辟仙霞古道攻入福建。在浦城兵分二路，一路攻闽北，建州刺使李乾佑闻风而逃，新任刺史李彦圣仓促应战中被杀，巢军一路直下南平。二路军向闽西进军，在建宁城东被当地人陈岩组建的“九龙军”打败，转攻将乐、沙县，折回崇安，再下南平。两路巢军在南平会合，再沿闽江而下围攻福州。十二月十三日，黄巢义军攻下福州，唐朝福建观察使韦岫战败弃城而逃。也就是说，至广明元年（880）郑镒受命时，福建已有两年空缺观察使，而福州也正被黄巢起义军占据着。郑镒面对声势正盛的黄巢义军，觉得自己根本无力收复福州，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陈岩统帅的民间武装“九龙军”，他请陈岩率部帮助收复福州。机缘巧合，此

时黄巢也急于想扩大战果，从闽南挥师广东，福州城只留少数兵马驻守。因此陈岩大军还未到福州城，守城巢军便弃城而去，陈岩的“九龙军”兵不血刃便收复了福州。鉴于陈岩收复福州有功，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初，郑镒奏请朝廷任命陈岩为团练副使，作为自己的副手。后来陈岩又击败了泉州刺史李连，兼任泉州刺史。

扩修福州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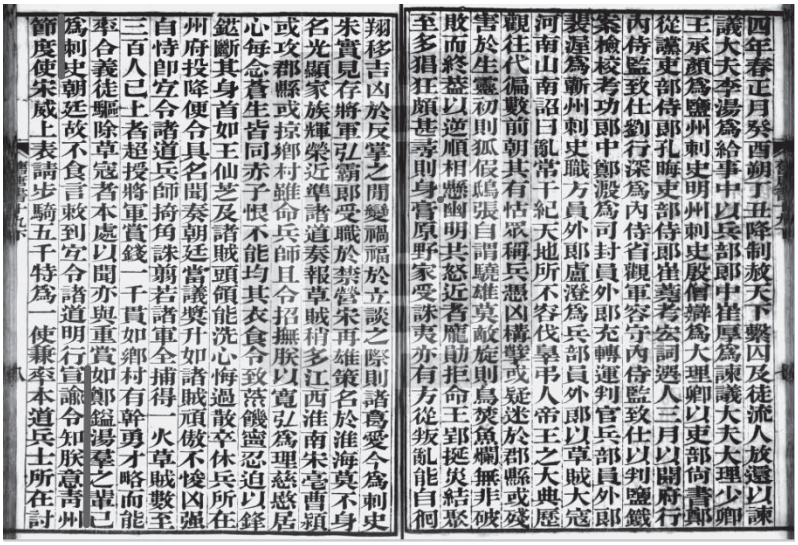
郑镒是一个修城达人，他不仅在温州修筑子城，而且在福州也修过子城。福州城与温州城选址有着相似之处，都有咨询风水大师郭璞的传说。严高建郡城，后因城扩大，故称为子城。与温州有区别的是，福州先有子城，后扩大范围建外城，而温州是先有外城，后建子城。据陈傅良撰写，梁克家署名的淳熙《三山志·地理类四·子城》（卷四），“唐中和中，观察使郑镒始修，广其东南隅”，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时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郑镒，曾扩修福州子城东南隅城墙，其范围“北起小山阜，南至虎节门，东起康泰门，稍西至宜兴门，东南至安定门，西南至清泰门”。子城奠定福州城池的雏形，自晋至南朝皆如此，唐五代至宋、明的城池也以此为中心。可见，郑镒任温州刺史时修温州子城，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时也修福州子城。

被陈岩取代

到了中和四年（884）年底，郑镒的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职务被陈岩取代。《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卷二百五十六）载：“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弘治《八闽通志·卷之三十》载：“陈岩，中和末逐观察使郑镒，自称观察使。”《新唐书》载：“初，黄巢将窃有福州，王师不能下，建人陈岩率众拔之。又逐观察使郑镒，自领州，诏即授刺史。”

对于郑镒被陈岩取代，史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郑镒主动上表辞职让陈岩取代，另一种就是被陈岩驱逐。司马光倾向于“表岩自代”。据《唐实录》：“七月，泉州刺史陈岩逐福建观察使郑镒，自知使务。”又：“十二月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

为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唐



《新唐书》

纪十七》（卷二十五）写道：“十二月，郑镒表陈岩为福建观察使。”其下专门作注：“岩既逐镒，则镒不在福州，岩安能逼之荐己？”，“按：刘恕《闽录》‘黄巢陷闽粤，岩聚众千余人，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左厢都虞侯李连，骄慢不法，纵其徒为郡人患。岩将按诛之，连奔溪洞中，合众攻福州，岩击破之。镒表岩自代，拜观察使。’今从之”。

对于两种说法，不管是被逐还是主动辞职，郑镒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离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是明确的。在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唐末，拥有强大的武装便拥有话语权，郑镒看到此时陈岩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远远超过自己，被取代是迟早的事，向朝廷表请陈岩代替自己也是形势所迫、审时度势的结果。此后再无查到郑镒在福建的资料。郑氏后人认为其祖先从福建迁入，却不知道福建对郑镒来说，是其仕途中的一站，这既是他仕途的最高点，又是他必须离开的是非之地。

由于时代久远，史料不多，关于郑镒的生平难以考证，只能梳理一个大致的脉络：郑镒，徐州下邳人，唐咸通九年（868），率三千人马响应庞勋起义，成为庞勋手下将领。唐咸通十年（869）五月降唐。乾符四年（877）任温州刺史，以柳木为栅造子

城。广明元年（880）升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任内曾扩修福州子城。中和四年（885）十二月被陈岩取代而离任。

（作者单位：鹿城区史志研究室）

参考文献：

1.弘治《温州府志》[明]王瓒 蔡芳编纂 胡珠生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2.《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6月出版。

3.《温州历史年表》沈克成著，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

4.《唐代进士录》陶易编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5.《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清]李慈铭校，浙江书局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6.弘治《八闽通志》[明]黄仲昭等纂 [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

7.淳熙《三山志》[宋]陈傅良撰写梁克家署名，[清]唐翰题跋抄本。

8.《通鉴考异》[宋]司马光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刻本。

9.乾隆《福州府志》[清]徐景熹[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补刻本。

试论提升县级综合年鉴开发利用水平的把控要素

◇ 周田田

县级综合年鉴编纂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的十八大以来，年鉴编纂工作空前发展，年鉴地域范围、行业类别覆盖都在持续扩展，并在“两全目标”[①]指引下，实现一年一鉴、县县有鉴。

近年来，精品年鉴频出，年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实现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目标转型。虽然如此，年鉴工作存在的问题仍不可忽视，如精品年鉴总体数量少、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水平不高等，都制约着年鉴编纂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县级综合年鉴开发利用的现状，探讨如何把控年鉴编纂、制作、传播与留存等关键环节，扩展年鉴开发利用面，对全面提升年鉴事业服务新时代的总体水平有较大意义。

一、县级综合年鉴开发利用的现状

年鉴属年际连续出版物，蕴含丰富的年度地情信息资源。但目前县级综合年鉴除存史作用外，资政、育人等方面还未达预期，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读者群体较少

由于地方综合年鉴专业性较强，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宣传力度不够。各地地方志办公室除每年5月18日前后及县级科普周活动期间，以发手机短信、设户外宣传广告牌、设展位等方式进行志鉴宣传外，并无更多创新的宣传方式，因而有关年鉴知识的社会知晓率并不高，公众读用传鉴面窄。年鉴的关注和使用者主要为部分决策层、离退休老同志、各领域的个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撰稿人等，尚未形成多元化读者群体。

（二）编纂能力有待提升

内容的实用性与丰富性是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而编纂水平直接影响年鉴的使用价值。

1.编纂团队问题。主要是编纂队伍人员不够。主编（执行主编）兼职过多，思路站位难免雷同，如以地市级的年鉴思路框架来设置县级的综合年鉴，出版的年鉴内容自然而然也就失去了地域特色。年鉴编辑队伍一般由退休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搭档组成，多者5—6人，少者1—2人，以临时外聘人员为主，专职及专业人才不多，也有些县（市、区）采用“外包”方式完成，因此，年鉴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在所难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编辑工作任务繁重且琐碎，且专业性较强，需较多业务知识沉淀；另一方面，主管单位未对年鉴的开发利用工作进行有效管理与引导，编纂团队对其自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及主观能动性较为欠缺。

2.编纂质量问题。一是供稿质量。年鉴编纂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各行各业，需要众多部门单位参与协助完成。近年来，县级年鉴编纂质量稳中向好，但编纂理念未能做到与时俱进，编辑部真正到基层去实地调研的情况并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各部门各行业直接供稿、媒体供图等方式。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是承编单位提供的，供稿人员是非专业人员，岗位变换流动快，而新同志对年鉴资料的选取较陌生，稿件质量也受到影响。在此过程中，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很可能会流失掉，等来年想用时，发现所需内容全无记载，这种情况在第一、二轮修志中就时常碰到。二是年鉴对社会信息和读者需求了解和传递不够，选题选材中有社会价值的资料相对欠缺，年鉴框架结构与时代脱节。如市场经济已运行多年，而某市（县）年鉴的篇目框架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有年鉴的固定条目不多，连续性、新颖性内容不足，选题选材以部门、行业提供为主，宣传性、事务性、成果性的内容较多，而如房屋销售数据、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便民措施、各项事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服务现实生活的内容较少。处在互联网时代，年鉴如果没有推陈出新，还是停留在浅层次记述，服务现实、读者可资利用、值得长久存查的有用信息资料呈现较少，那么读者弃年鉴而寻他类读物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出版周期长，时效性较低

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县级综合年鉴一般在次年一季度至下半年这段时间内完成出版。这样滞后的年鉴编纂工作进度，严重影响了年鉴的文化传播效果。年鉴是逐年出版的

资料性工具书，是记述上年度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如果没有时效性，那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可靠参考的作用就会减弱。

（四）发行途径较单一，影响年鉴读、用、传的范围

年鉴的发行量，是衡量其实用性的重要指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地方志部门运用市场办鉴模式，扩大年鉴的发行。随着年鉴工作机构管理体制转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转为公共文化产品，大多数地方志鉴部门都采取赠阅的方式，发放对象大部分为年鉴资料的提供者，各供稿单位、图书馆、出版机构等。若出版发行的时间适逢地方“两会”召开，也会安排赠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因每年年鉴的印刷数量有限，发行面自然也就有限，供稿单位以外的群体较难获取，知晓率也不高，存在想看的人看不到、想用的人用不着的情况。如某市（县）地方志工作部门应邀参加该市举办的科普周广场宣传活动，地方志单位展位前排起长龙，准备赠阅的方志和年鉴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群众领取完毕。可见，群众们对读鉴、用鉴还是有很高的积极性。

（五）数字化程度不高

年鉴传播媒介和途径较为单一，已编纂出版的年鉴较多是纸质版（部分年鉴随书后附光盘、全书二维码），尚未全部完成出版数字化。一些有方志网站的地方志部门上传数字化后的年鉴也存在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往往看不到次新、最新出版的年鉴，受众极为有限。

二、拓展县级综合年鉴开发利用的几个要素把控

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是编纂工作的落脚点。如何改变目前县级综合年鉴读、用、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拓展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形式和内容，完善提升地域年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注重精品意识，提高编纂质量和出版速度

1. 优化框架设计。年鉴编辑要勇于创新，多实践、勤思考，创新整合年鉴体例和入鉴内容，做到科学合理、突出重点、特色鲜明。在常规的框架内容基础上，通过篇目和栏目的特色化设置，凸显年鉴的个性化。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根河年鉴（2017卷）》优化框架设计，在“附录”新增艺文选辑，收录了中

国独有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文章，让读、用鉴者了解到中国最后一个游猎民族保留至今的最传统、最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大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

2.选题选材全面。一是在梳理研究把握地情的基础上，年鉴选材要尽可能精确，适度挖掘和拓展地域深层次资料，打破年鉴内容主要依靠承编单位供稿的局限。通过查档案、报刊和浏览部门、行业的官方门户网站，以及通过调查访问、利用大数据提取关键信息等方式进行搜集，选录能表现全年新变化、新情况并且有重要意义的数据和资料，着重突出地域和年度特色，使县级综合年鉴饱含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年度本土网购人数、日均网购量、电商从业人数等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居民年收入和支出、商业服务客流量等数据。之前，收集这些数据极其困难，现在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从相关行业数据库收集整理，使年鉴真正成为集成大数据的信息资源，为地域经济战略布局、企业生产投资决策、热门行业发展前景趋势分析研判等方面提供依据与参考。同时，在确保年鉴工具书基本性质的大前提下，年鉴工作者要坚持为民服务，在选材内容上要注意全面反映贴近群众生活的实际话题。如地域食品安全状况，劳动力市场需求，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处置疫情、灾害或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老旧小区改造，市场物价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等公共信息内容，提高年鉴的有用信息容量，努力实现年鉴的信息化、大众化和实用化。二是把条目编写作为提升年鉴质量的主抓手。年鉴条目编写的质量直接关系全书质量，重点记载年度内的大事等独具特色的资料，要全面客观反映年度发展动态信息、系统完整的社会需求公共信息。如《信访工作》中的【概况】条目，要记载信访部门年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数量、与上年对比的情况、反映的问题种类、如何化解处理、群众满意度情况等内容。深化信访综合内容记述，对提升基层信访工作水平，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有裨益。三是正确选用图表。一图胜千言，照片能对客观事物作更真实的留存，而数据图表在呈现时采用色差凸现，更能使人一目了然。但是在年鉴编纂中，经常会遇到想要的图片手头没有的情况，这也要求年鉴编纂者要养成主动寻找、主动拍摄的习惯。

3.提升年鉴编纂工作数字化。近年，一些地方启用年鉴数字化编纂系

统，如2015年，温州年鉴编纂信息系统投入使用，供稿单位可以通过该系统在线报送稿件，这在全国属首例。通过系统，年鉴编辑部可以精准把握供稿和编纂进度，实现在线编纂，全程无纸化办公，大大提高编纂效率。2022年，杭州市拱墅区启动杭州市首个年鉴编纂全流程数字化运维平台，系统集供稿端、审稿端、管理端及数据库、驾驶舱等于一体，具有“在线编、在线存、在线查”三大功能，实现了年鉴编纂全流程数字化和编纂进度、质量及资料应用情况的一屏掌控。在平台对交稿、编辑进度等一目了然，完成了从组稿到核稿再到校稿的一整套工序，为搞好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打牢根基。

4.加快年鉴编纂出版进度。年鉴编纂出版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和年鉴受众需求，增强出版时效性。地方志部门要将年鉴框架设计、组稿情况、编纂阶段进度、公开出版时间节点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建规立制，系统把握年鉴编纂各个环节时序进度，建立例会周报制度，汇报收稿及质量情况，实时推进编纂全过程把控。在时间上，可采取以下方式：年初组稿编纂，9月底前完成全书初稿编辑、核实、总纂，10月底前完成全书出版审查并交付印刷，确保编辑工作在出版年内完成。编纂过程中，编辑应将供稿须知和体例规范以书面形式告知撰稿人，提升稿件的规范性和实用性。

（二）由“闭门造车”向“走出去”编纂转变

在确保年鉴工具书性质的大前提下，年鉴工作者要坚持为民服务，进一步向“民需”靠拢，编纂前后一定要走出门，深入基层社区，开展走访调研工作。用发放问卷和现场采访等方式，收集读者意见和建议，感知目标读者、广大群众喜欢阅读年鉴的哪些内容，形式上需要哪些变化等等，这样才能把年鉴编成既是工具书，又是资政、科研、民需民喜的读用出版物。年鉴工作机构要适时通过在社区开设年鉴知识讲坛、召开年鉴评审会等形式，在获知编纂的年鉴内容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也宣传了年鉴蕴含的地情文化，拓宽与众多读者、研究者的沟通和交流渠道，提升年鉴在社会上的知晓度。

（三）加大纸质年鉴发行力度

年鉴发行工作关乎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赠阅与交换的方式，同全国年鉴工作机构进行互动交流，扩大纸质年鉴发行范围。地方志部门要创新方式，拓宽年鉴阅读途径，加大与宣传展

示地情的公益文化服务部门、场所合作，如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农村文化礼堂、城市书屋、方志馆、为民办事大厅等，开发利用年鉴资料信息资源。继续推动年鉴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等读鉴用鉴活动，把年鉴摆上公共借阅书架，让读用鉴更方便，逐步在全社会培育浓厚的读用传鉴意识，提高年鉴的利用率。

（四）全空间化传播

开放共享是大数据时代的显著特征，年鉴工作部门要借梯上楼，突破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把全空间化传播作为公众利用年鉴信息资源的主要方式，推动年鉴传播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在确保年鉴原有传统文化优势的同时，积极应对数字化改革挑战，推陈出新，记录新时代、服务新时代。全力融入新媒体，整合多元化传播媒介，以数字化带动高效率传播。如创建微信公众号，选择年鉴中最能反映地方特色的部分，如养老方式改变、生态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原因、医疗卫生收费情况、农村教育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景点和历史遗迹等社会热点，再配上精美的图片，直观、动态地展示年鉴的文化魅力，并从读者留言和点评中，快速知晓读者对年鉴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建议意见，真正实现编、读、用、传鉴良好互动。还可以开发年鉴数据库，实现年鉴资源数字化，利用OCR技术，扫描以往已出版的年鉴，方便读者运用关键词快捷检索查阅信息，充分利用年鉴资源。在此过程中，年鉴编纂人员可通过收集读者检索频率较高的内容数据，调整精准编辑方向，提升全书的有效信息量，更加贴近读者需求和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谋求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

（五）营造年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学术氛围

年鉴作为地情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强、信息量大、真实性高的特点，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决策、社会公众了解地情文化提供信息服务。志鉴开发利用，专业人才培养不可忽视，要把乐于奉献地方志事业的高素质人员充实到地方志工作岗位上来。年鉴工作部门要树立精品年鉴编纂和开发利用并重的理念，拓宽志鉴开发利用工作视野，认真规划，鼓励年鉴工作者业余结合工作感悟，谋划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以理论研究常态化促进年鉴开发利用创新发展，并将其纳入年度考评考核。还可

由地方志学会、社科联等学术团体主办，地方志部门协办，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座谈，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推进年鉴地情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方法趋多趋好。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县级年鉴开发利用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社会需求，积极应对年鉴事业转型升级需要，从数字年鉴融入数字政府建设的视角开展顶层设计。要增强质量第一、编鉴为用的意识，搜集实用性年鉴资料，注重地域特色与优势，拓宽年鉴读、传、用渠道，形成全媒体宣传格局，加强年鉴编纂队伍理论与实践水平，在推进年鉴资源实现数据共享、提高开发利用水平等方面下足功夫，在探究事物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规律等方面提供权威资料，真正使年鉴成为实用性、便利性、普适性的权威工具书。

〔作者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研究室）〕

注释：

①“两全目标”是指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寻访革命印记 砥砺红色初心

——林心平烈士足迹寻访记

◇ 王 祥

2024年，平阳县山门镇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在林心平烈士的故乡——西山村建设林心平烈士陈列馆。为使新展馆的史料更加丰富、更为精准，筹备组在原有《林心平烈士纪念文集》的基础上，决定赴林心平烈士工作地、被捕地、牺牲地的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和常州市溧阳市、金坛区、武进区进行一次全面的走访，开展史料搜集与考证。于是，有了此次“寻访革命印记 砥砺红色初心”——林心平烈士足迹寻访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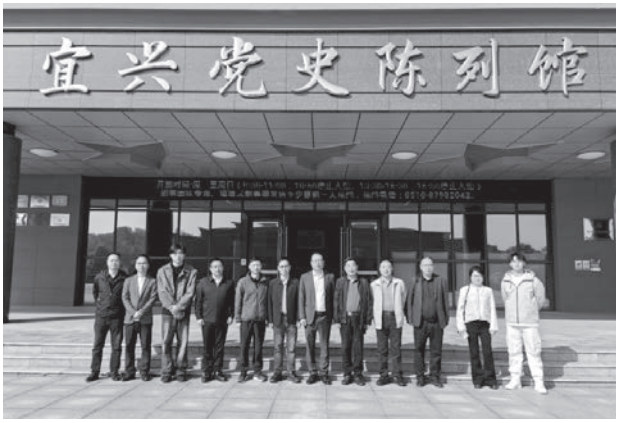
一

2024年4月8日上午7时，考察组一行准时出发。下午3时，考察组到达了官林镇官林小学。官林小学是林心平烈士的牺牲地，官林镇党委也非常重视，在学校里建立了林心平烈士陵园和林心平烈士纪念馆，供学生及党员干部群众实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因为清明刚过，考察组特向林心平烈士敬献了花篮。在当地党史部门、官林镇副书记、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学校负责人等陪同下，考察组参观了林心平烈士陈列馆，仔细观看了馆内的图片、实物和文献资料，特别是对还没有掌握的史料，进行了拍照和问询。



林心平

随后，在宜兴市档案史志馆副馆长朱俊峰的带领下，考察组乘车来到了宜兴市档案馆，与档案馆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会上，对宜兴市党史一卷出版、五县联合政府排序、林心平烈士牺牲的具体经过等问题进行求证。宜兴市档案史志馆原主任管新元对当地党史研究得非常深入，对许多



考察组在宜兴党史陈列馆前留影

问题都进行了解答。他还特别提出平阳在做展陈时要注意林心平烈士的牺牲过程，网络上宣传的用钢丝穿过肩胛骨、赤裸着上身、日本人赶着群众来围观等都是有失偏颇的。他说，当时驻扎在宜兴的日军职务最高的是大佐，只有约600人，在官林镇则只有一个据点，仅有一个班的力量。而新四军的人数是占优势的，日军远远没有达到这样肆无忌惮的程度。

4月9日上午，在朱俊峰的带领下，一行人参观了宜兴党史陈列馆。这里展示了自1926年中共宜兴独立支部建立，近百年间宜兴的社会变迁。展陈里，有许多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如展板色调的搭配、光线从昏暗到明亮的变化、解放城门的复制等。其中有一处展陈让大家非常感兴趣，宜兴市收集了当时还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的手印，做成了一块“不能忘却的记忆”的展板。遗憾的是，平阳新四军老战士都过世了，这样的手印已无法做出来。

接着，一行人又去参观了邵氏宗祠，该地位于宜兴市和桥镇闸口村，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太滆地委驻地，太湖行动委员会、锡宜武三县行动委员会、锡宜武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新四军独立二团、新四军十六旅等均在此成立。这个场馆体量不大，可取之处在于是原址保护，里面有几处值得学习，如新四军战斗示意图和军民一家亲部分的红色故事。

二

下一站，考察组前往常州市溧阳市。在溧阳市党史委员会副主任董文博的带领下，参观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新馆和旧馆。此次，负责讲解的是该馆原馆长的女儿，她不仅对展陈内容了解深入，而且对整个新四军的历程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参观中，考察组被新馆入口的大幅群雕震撼，视觉冲击极其强烈。展陈的实物



考察组召开座谈会

非常多，新四军战士的照片就达400多幅。讲解员在介绍时说，她的父亲通过与新四军老战士的后人对接，再联系其他的后人，几十年如一日，才收集到今天这样规模的展陈实物。通过参观，也坚定了考察组要尽全力为林心平烈士陈列馆收集实物、丰富展陈的决心。

在参观旧馆时，经过粟裕将军和夫人楚青的骨灰敬撒处，大家都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平阳山门的挺进师陈列馆就有讲述粟裕将军的故事，也有他的骨灰敬撒处。一行人向骨灰敬撒处三鞠躬，表达崇高敬意。在旧馆参观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自行拍照的老式照相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现场拍照后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传到手机上。这样的互动非常好，以后建设场馆时也可以参考借鉴。董文博还将溧阳制作的有关林心平烈士的视频发给了考察组，这对展馆后期展陈布置很有用。

三

4月10日上午，考察组前往下一站常州市金坛区，先到林心平烈士的丈夫诸葛慎的故乡——儒林镇鲁墅村。金坛区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吕洪力和儒林镇宣传委员带着大家参观了该村。之后，来到林心平烈士被捕的地方——树德堂。树德堂负责人马医生向考察组讲述了此处的历史，但在讲述林心平烈士被捕经过时，与我们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例如他说林心平在树德堂看病时是比较公开的、双方枪战时有一人死亡等。他记得自己家里有一本书讲到这些，回去后可以帮忙找一找。此时，宣传委员想起诸葛慎的侄子诸葛鹤就在边上开牙科诊所，一行人就到了诸葛鹤家中，与他聊了约半小时，初步掌握了诸葛慎的家庭情况和组建游击队的历史。

下午3时，考察组到金坛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召开座谈会。金坛方

面参会的除吕洪力外，还有分管党史的副主任张继华、原主任陈书明及科室负责人。会上，吕洪力将金坛有关林心平的书籍赠送给我们。其间，交流了林心平策反特务营经过、“长漪三杰”另外两位女性是谁、镇压蒋四麻子经过等问题。值得感动的是，在考察组离开后，陈书明又找了一些林心平史料发给我们。

四

4月11日上午，考察组前往武进区。根据武进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炜晴的安排，我们先到林心平烈士曾经作演讲的地点——东安小学处。由东安小学校长沈加彬带着参观了校园，介绍了东安小学的历史概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主要是围绕着林心平当时工作的地点——武九区的范围进行深入讨论，武进区党史工作委员会的几位同志也不是很了解，认为金坛区占大部分。后来，在他们提供的诸葛慎文章中知道了武九区和武二区的大致位置。

下午，去了天虹纺织大明纱厂参观。林心平的哥哥林怡曾在这里工作了两年。负责讲解的是一位退休老同志，他参加了当地的红色宣讲团，在交流中得知，天虹纺织大明纱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资料找不到，展陈中此块还是空白的。

4月12日，考察组参观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金华市义乌陈望道故居，收获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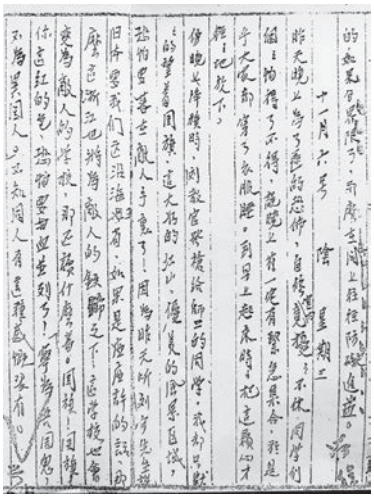
5天时间，匆匆而过。此行，一方面，收集了许多的实景，为场馆建设仿照实景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收集了许多林心平烈士的文章，为今后正式出版的《林心平烈士纪念文集》增添史料。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不断的参观展陈中，我们对林心平烈士陈列馆展陈设计有了许多新的想法和构思，构筑起了展陈的大致轮廓。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当一座全新的林心平烈士陈列馆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必将成为平阳又一处重要的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林心平烈士日记摘抄

◇ 蔡少盾

2024年10月30日，是国家民政部首批公布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林心平诞辰105周年纪念日。8月中旬，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名誉会长朱文泉上将欣然挥毫，为即将建成开馆的林心平烈士陈列馆题写馆名。落款时，他尊敬地写上“朱文泉敬书”。据其老部下讲：首长题字落款“敬书”极为少见，是林心平烈士抗日爱国事迹和英勇牺牲精神感动了朱上将，才会有此敬重的落款。林心平的爱国主义精神于1935年和1936年间就已显现，她当年在温州师范学院读书时的日记就清楚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借此机会，将林心平烈士日记部分摘抄如下，供后人学习。



一

（1935年）11月6日，阴，星期三

傍晚，降旗时，刘教官发枪给师三的同学，我却只默默地望着国旗，这大好的江山，优美的风景区域，恐怕要落在敌人手里了！因为昨天听刘宇先生说，日本要我们这沿海五省，如果是应许的话，那么，这浙江也将为敌人的铁蹄之下，这学校也会变为敌人的学校，那还读什么书。国旗！国旗！你这红的色，恐怕要与血并列了！“宁为吾国鬼，不为异国人。”不知国人有这种感慨没有。

二

（1935年）11月12日，晴，星期二

今天是总理逝世（按：诞辰）纪

念日，放假一天。上午七点钟开纪念会。经周启才先生与朱则扬先生（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报告，大略是：孙先生一生的努力，其革命事业，席不暇暖地奔走，而于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即辞别这扰乱的中国，而到现在，中国已是千钧一发中矣！这算不定的亡国，也许不久即来临，那总理血汗换来的中华民国一旦如落人手，是多么可痛心的事！

三

（1935年）11月22日，晴，星期五

上午第四点钟音乐，唱的是“苏武牧羊”歌，想起了苏武能在那冰天雪地里，吞毡饮雪，穷愁十九年，而不辱其节，可见其心坚得如铁石般的。在现在的我国，如果战场上健儿，都有如此铁石的心，坚决的志，哪里还怕这些乌合的乱匪，区区的日本呢！

四

（1935年）12月3日，雨，星期二

天突然冷起来，雨霏霏地下着，令人又冷又闷，世界上为了产生出一种阶级，所以便有上下贫富之分，富者固然能以其所得而尽量地挥霍，而哪知这冷天之下的倚门求乞的穷人呢？阶级，我们应铲除之；穷人，应该扶助之。这是未来的唯一责任。

五

（1935年）12月12日，雨，星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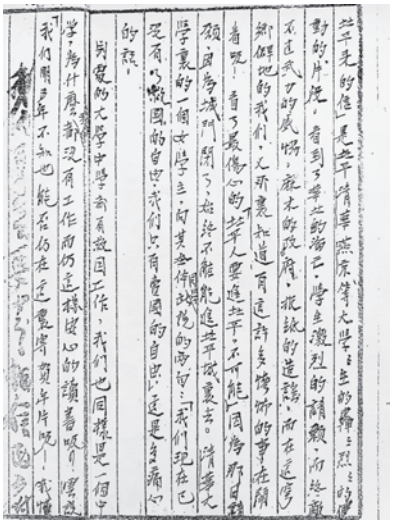
早上考音乐（乐理），在以前对于乐理方面，我总是没有明了，昨天与昨晚，骆先生详细地解说给我们听，于是我恍然明白。对于那些什么“三连音，二分法，三分法”“音程乐的阶梯”，又什么“加点，重加点”都略略能知道一点，所以笔下也流顺些。吃过午饭，在骆先生房间里看到了“100”分，我也自觉快乐。今天又接到大哥（林怡）寄来的《世界知识》与《大众生活》二本书，其实书已寄来了一大堆，我却没有尽去看，想到古人借雪光而阅读书，我也应当开夜车来看尽，然而事实却不能允许我的。

六

（1935年）12月28日，阴，星期六

晚上接到云（蔡翠云，温中学生，林心平表姐）的信，使我难过又难为情，因为前星期寄了一本《大众生活》给她，贪于便，且也没功夫写信，遂在纸条写了两句，问她几时回家。夹在书内，哪知被邮局查出了，罚了三角，这真是我第一次的教训。

信里面附着一张温中学生救国会印行的“一封从北平来的信”，是北平清华、燕京等大学学生的轰轰烈烈的运



动片断。看到了华北的沦亡，学生激烈的请愿，而终敌不过武力的威胁。麻木的政府，报纸的造谣，而在这穷乡僻地的我们，又哪里知道有这许多的惨怖的事在闹着呢！看了最伤心的“北平人要进北平，不可能”，因为那日请愿，那里城门闭了，始终不能进北平城里去。清华大学里的一个女学生向其全体同学所说的两句，“我们现在已没有了救国的自由，我们只有卖国的自由”这是多么痛心的话。

别处的大学、中学都有救国工作，我们也同样是一个中学，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工作（指抗日救亡运动），而仍这样安心地读书呢？云说：“我们明年不知也能否，仍在这里寄贺年片呢！”

七

（1936年）3月9日，晴，星期一

上午的国文课，所教的是一首“军中歌”，很能激发士气，现在我把它抄在这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
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
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险艰？
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
马磨马耳人磨肩，前！前！前！

八

（1936年）3月16日，晴，星期一

因为今天纪念周是有时事报告的，所以我不得不拿报来翻翻，看到一段如下：

日有二十多架轰炸机飞向东北来，廿日日本的陆军在南开演习，日本武官都到东北来了……

诚然，不但是日本，就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已在这非常时的1936年准备爆发了。然而，回观中国呢？爱国运动是政治犯、卖国贼殷汝耕倒被政府所优待，这不是开倒车吗！

……

（作者系温州中共党史学会、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

清末泰顺籍学生林宗强的“大学文凭”

◇ 陶汉心

温州教育史馆近代教育展厅内东南角墙上，有一张清末高等学堂的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是浙江省官立高等学堂于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初四，发给温州府泰顺籍学生林宗强的，是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毕业文凭之一。展品为复制品，原件藏于温州市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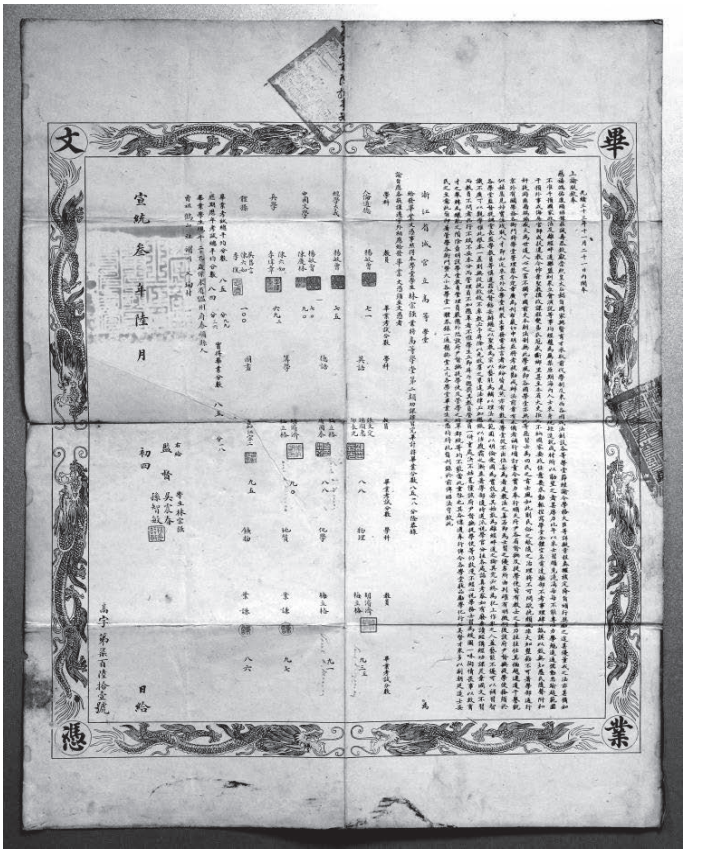
这件展品纵长71厘米，横宽54厘米，四面边框装饰着八条五爪龙，每边两条龙，头对头排列。边框四角嵌着“毕业文凭”四个楷体字，框内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字，很像一张布告。

一、文凭内容

这张毕业文凭正文分为两部分，右边前面部分为慈禧太后懿旨，左边包含了颁发文凭的学堂名称、毕业生姓名年龄籍贯、学科名称、毕业考试分数、教员姓名、三代家长姓名、监督（校长）姓名、填发日期、学堂官防（公章）、毕业证号等内容。除形式独特别致外，其内容有四大特色：

一有慈禧太后懿旨。这张文凭前面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内阁颁布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即慈禧太后）懿旨，共13行，875字，约占文凭版面的三分之一。慈禧太后懿旨首先指出“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降旨颁行章程，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谊纠众、立会、演说等事”，整饬校规学风，严惩失责学堂教员、管理员及各级官员。“俾令各学堂敦品励学，化行俗美，贤才众多，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最后，要求各学堂恭录此旨悬挂堂上，毕业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

二有学科考试成绩。这张文凭主要内容是各学科考试成绩。分三排罗列了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兵学、体操、英语、德语、算学、图画、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等13门课程，可见当时高等学堂的课程设置有思想品德、外语、语数、理化、体育、美术，还有军事知识等。每门课程下面，都标明了毕业考试分数。林宗强成绩优良，毕业考试体操成绩100分，地质97分，最低是兵学69.3分，人伦道德71分，经学大义75分，其余都是八九十分。文凭上还注明毕业考试总平均分数85.99分，历年考试总平均分数84.36分，实得毕业分数85.18分。这张文凭，犹如一份学业成绩总报告单，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科学习成绩，一目了然。



清末高等学堂的毕业文凭

三有课任教师钤印。这张文凭上，每门课程下面都有任课教师的姓名和大红印章。13门课程共由16名教师执教。有的一门课始终由一名教师授课，有的一门课由两名教师授课，英语和体操两科先后有三名教师授课。16名任课教师中，有的教师只教一门课，有三名教师各教两门课。杨敏曾先生除担任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两科教学外，还兼教中国文学。梅立格先生一人独教化学外，还兼教物理、算学、德语。有13位教师名下盖有私章。文凭中有任课教师姓名钤印，使学生永远铭记老师，不忘师恩，体现

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四有三代家长留名。这张文凭上，标明“毕业学生现年29岁，系本省温州府泰顺县人。曾祖鹤山，祖渭川，父珣材”。毕业文凭获得者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三代名讳，特别一一注明，颇有光宗耀祖之意。毕业文凭又有点履历表的功能。

此外，这张文凭上有两名监督署名：吴震春、孙智敏，孙智敏名下钤印。还有颁发日期和证书号：高字第761号。

二、林宗强其人

根据民国里庄（里光）《林氏家谱》的记载：“林宗强，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少名添麟，字廷书，号智民，出生书香门第，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毕业，优等第四名，照奖拔贡元。”从林氏家谱并参考《泰顺胶庠录》等资料来看，从林宗强这一辈往上溯，其六世祖、湖州府学训导林绍昌开始迁居司前里光村，至其父亲林珣材，“历六世，皆有功名”。其曾祖父，林松，字茂如，号慎庵，又号鹤山，乾隆五十九年（1794）考入泰顺县学。祖父，林典锦，字叔韬，“授职登仕郎，配永嘉陈氏，生子二，传永、传序；女五，长适郡南郊张森郎，次适郡南郊郑亚兰，三适百里坊王飞标……”说明林宗强的祖父辈已侨居温州府城。父亲，林珣材（1853—1904），又作林荀材，行名传序，号次鹤，同治十三年（1874）考入泰顺县学，此后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直在泰顺县学深造，说明林家未加入温州城区户籍，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中拔贡生，之后授职安徽直隶州州判。依据以上记载，可以判断，尽管林宗强自从祖父辈已侨居温州府城，但祖孙三代的籍贯、学籍还在泰顺。特别是从其父亲林荀材长期在泰顺县学“游泮”（1874—1896）的经历来看，林宗强作为侨居温州府城的泰顺人，他与泰顺的家乡情缘还是很深的。宣统三年（1911）六月，林宗强自浙江省官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关于他的事迹记载甚少。据郭凤诰《募建籀公纪念祠启》和胡珠生《温州近代史》等史料记载，为了纪念晚清大儒、已故教育家孙贻让先生，1914年，温州学界人物在永嘉县教育科长郭凤诰的吁请下，得到热心人士的慷慨集资，以所购得的温州松台山西北麓依绿园旧址建造籀公祠，又在祠旁准备构筑公共藏书室（藏书楼）。当时为筹建藏书室，原温州府属地六县（包括玉环）

各推举绅士一人为经理员，泰顺县推举林宗强。后经温州六县绅士集议，在藏书楼的基础上建设六县公立图书馆。1919年5月9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定名旧温属公立图书馆。

三、毕业学校

林宗强毕业的学校——浙江省官立高等学堂，是全省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据《浙江省教育志》等书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根据清廷兴学诏书，浙江求是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正月改称浙江大学堂。基于当时的学生学识未达到大学堂的程度，清廷决定除北京京师大学堂外，各省所办的大学堂均改为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据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浙江大学堂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按《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应招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但其时学堂初设，尚无此等合格学生，故先设预科，招收确有文学根底、在中学堂有一两年程度者入学，补习历史、地理、算学、外国语、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音乐等课程，修业期3年。1912年，浙江高等学堂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14年至1927年间暂停办学。1927年恢复办学，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1928年7月称国立浙江大学。

〔作者单位：中共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20世纪80年代乐清民间金融风暴纪实

◇ 林丽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乐清农村商品经济也随之迅速发展，群众手头持有货币增多，社会游资大量增加，民间借贷活动日渐活跃。

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经营上产生了大量资金需求，可当时国家对信贷的宏观控制较强，银根紧缩，加上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金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当个私经营者出现大额资金需求时，只能向民间借贷寻求帮助。

乐清的民间借贷，比较有名的就是“民间聚会”[①]。“民间聚会”历史悠久，名目繁多，在群众中影响颇深。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矛盾，借传统“民间聚会”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由于活动依附于群众习以为常的经济交往，又打着“民间聚会”旗号，其犯罪意图不易察觉，具有很强的欺骗性。20世纪80年代，乐清相继发生了“抬会”[②]和“平台倒会”事件，严重扰乱了全县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其影响之大、危害之重，史无前例，一度引起全国关注。

“抬会”事件始发于1985年八九月间，在海屿、乐成、柳市率先出现，于年底得到迅速发展，到1986年二三月间形成高潮，蔓延至乐清全县，波及温州地区除泰顺县以外的7个县和鹿城、龙湾2个区，以及邻近的玉环、温岭、青田等县。“抬会”由大会主、中会主、小会主、背会（中介人）、会脚等组成，会主大多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抬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为期100个月的长会和为期1至3个月的短会。“抬会”活动利息资金无来源，会主不花一分钱，全靠会脚的会款，用后入会者交的会钱支付先入会者的本息，从中混水摸鱼，牟取暴利。

为把“抬会”维持下去，会主必须大量发展会脚，靠不断发展会脚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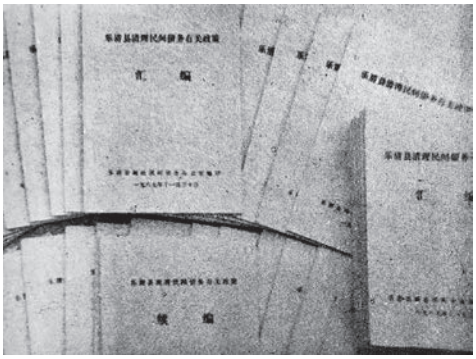
高额利息，一旦停顿，必将不可收拾。资金在“会”里转来转去，脱离了生产和流通，不仅不能为社会增值，反而埋下了巨大的社会金融危机。由于大量闲散资金被“抬会”垄断，迫使民间借贷利率从一般月息2.5%—3%上涨到10%—12%，不断加剧资金周转难度，使得银行储蓄存款量迅速下降，农村信用社存款业务难以为继。

在超高利率的引诱下，1986年初，乐清“抬会”会款累计发生额达10亿多元，实际投入资金2亿多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抬会”卷入群众总人数20余万人，乐清参加户数占全县总数的30%，海屿、万岙、盐盆、柳市等13个乡镇入会户数高达70%，情况严重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参加“抬会”。

面对“抬会”活动的投机性和欺骗性，许多干部群众纷纷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反映。乐清县委、县政府对此多次研究，并展开调查。由于当时法律制度尚不完备，没有及时有效的监管举措，在“抬会”活动对社会产生极大危害之时，难以给予及时的打击。如1984年乐清第一个“百万会”倒会，对会主的刑事处理找不到法律依据，难以定罪量刑。至1986年1月，“抬会”多数会主的巨额资金逆差已经无法解决，资金周转开始失灵。许多会主采取缩短会期、降低会款的方法支撑危局，“抬会”活动已处于崩溃边缘。

1986年1月24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就乐清“抬会”问题作出批示：“对出现的扰乱金融的各种民间组织要坚决取缔，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制裁。”2月14日，乐清县政府发出《关于严禁“抬会”“摸会”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布告》，接着又召开了全县广播大会，宣传“抬会”的欺骗性、非法性。但由于“抬会”是隐蔽活动，内部操作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掌握，使得打击“抬会”的相关宣传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效果，更有一些会主大肆散布谣言，将其诬为“假布告”。“抬会”活动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3月19日，乐清县委、县政府决定搜查12名大会主，发现问题后立即收审。但由于消息泄漏，大会主纷纷潜逃。县政府立即组织力量，连续几天对少数首要分子进行集中打击，并着手对会案进行查处和清理。22日，县政府发出《关于清理会案的公告》，进一步明确对清理会案的态度和措施。27日，县政府又发出关于清理会案的若干规定的通告。28日，县公检法司发出关于坚决打击破坏清理会案



为清理会案，乐清县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工作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在强大舆论声势下，“抬会”非法活动终于被遏制住。

“抬会”活动被刹住之后，落会群众人心惶惶，纷纷向会主索取会钱。而会主由于会款相互转递，一时无法清退，又怕被抓走，纷纷逃匿。这种情况下，不少会脚聚集会主家中吵闹，捣毁财物，绑架人质，闹得满城风雨。一些情况严重的乡镇，债权人成群结队上访，政府机关一度无法正常办公，致使社会秩序一度混乱不堪。甚至有一些债主为了不再受暴力逼债人的折磨，居然托熟人找关系，自己主动要求去坐牢。

为迅速平定“抬会”之乱，3月24日，中共温州市委派出调查组到达乐清。其间，省委常委袁芳烈召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门听取乐清关于取缔“抬会”情况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市委书记董朝才到乐清受“抬会”影响较严重的地方进行调查，就如何妥善解决“抬会”问题，和市委调查组共同研究和部署。根据省委、市委的指示精神，县委、县政府和市委调查组一起认真分析了当时局势，研究清理“抬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解决“抬会”问题“四个有利”[③]的指导思想，将具体工作分为宣传教育、清账、退款、处理四个阶段进行。5月8日，乐清县委成立县清理会案工作委员会，下设审查教育组、清账指导组、治安宣传组。随后，抽调了近200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到13个重点乡镇，帮助清理会案。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都派出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处理有关问题。发生会案的重点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清理会案工作班子，从组织上保证了清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做好清会工作，保护群众利益，8月16日，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开展清理会案活动月活动。第一次清理会案活动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底，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清理会案工作，要求重点乡镇和百万元以上会主清退率达到90%至95%以上，其他乡镇、

单位要基本清理结束。第二阶段从10月1日至10月底，为政策兑现、全面处理阶段，要求全县范围的“抬会”基本处理结束。8月18日，县委召开清理会案活动月动员大会，将清理工作进一步引向高潮。9月23日，乐清成立清理会案活动月指挥部。经过半年多努力，全县清理会案成效显著。截至10月10日，全县清退会款累计总额达8.48亿元，占会款总发生额的90.4%。全县有1293个大中小会主，有235人基本退清，100多个百万以上的会主中有15个全部退清，许多落会群众从“抬会”中解脱出来。

但在清会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催收会款工作进度不快，一些地方和单位清理会案出现了停顿的局面。10月15日，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做好催收会款工作彻底清理会案的通知》，并向会案重点乡镇增派18支催收会款工作队。12月26日，县政府发布《关于偿还“抬会”债务的通告》，对“抬会”债务有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是年，全县城乡储蓄从“抬会”期间的迅速下降转为逐月增长，平均每月增长283.6万元，其中1986年4月就增加了746万元。是年底，全县城乡储蓄总额达5881万元，比1985年增长137.4%，超额347.9%完成吸收储蓄的任务。

1987年春节以后，全县清会工作开始有所松懈，一些类似“抬会”的非法金融活动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因会案引起的社会治安事件有所回升。1987年5月6日，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开展第二次清理会案活动月活动，从5月中旬开始至7月中旬结束。清会活动中，县委、县政府相继派遣500多名机关干部，设立了17个专案小组。其间，各重点乡镇几乎投入全部力量抓清会，做到思想教育、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四管齐下，全力推进清退工作。在宣传上，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形成浓厚的清会氛围，以强大舆论压力，冲破会主和得利者企图抗拒清退的精神防线，助推工作有力开展。在措施上，实行定人、定时间、定任务的“三定”清会责任制。在催收过程中，对得利不退者举办学习班，并抓住得利者集中又不清退的地区实行重点突破，迫使得利者以资抵债、破产还债的方式偿还“抬会”债务。

随着清会工作的深入，公职人员得利款的清退成为工作难点。1986年10月，县委、县政府狠抓公职人员清退工作，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会案开展全面普查。在普查基础上，县

委于1986年、1987年先后发出文件，责令公职人员限期清退。1987年6月5日，县委还专门成立公职人员会款清退组，狠抓清退措施的落实。在清理过程中，对应退未退的公职人员采取停薪停职等措施，促使其抓紧清退；对在“抬会”中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处理；对态度恶劣、拒不清退的，则给予开除公职的处理。

两次清会活动月活动，有效扩大会款清退途径，加快清退速度，给得利者以沉重打击，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至1987年11月，全县会款累计发生额10.04亿元，清退9.53亿元，会款清退率达95%。大多数会主基本退清，落会群众解脱面达90%以上。是年，因会案引起的吵闹、斗殴等现象大为减少，社会治安好转，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趋向正常。

为规范乐清民间金融市场，1988年1月9日，乐清县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民间“聚会”管理的通告》，对民间聚会的会额、会期、人员作了规定。同月，县政府还发布了《严禁以盈利为目的金融聚会的通告》。3月17日，政法部门在乐清剧院召开打击处理大会，对14名涉及会案的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判决。至3月底，全县“抬会”清理工作基本完



群众“清债组织”整理部分档案材料

成，按实际投入现金2亿元估算，清退现金1.6亿元，清退率达80%。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抬会”引发的金融风暴还未完全平息，乐清又迎来了第二次民间金融风暴。为摆脱资金困境，一些原来的“抬会”会主开始大量发展“平会”（即正常的民间经济互助会），而群众对此不加警惕，经不住会主“劝说”，纷纷入会。

“平会”的聚会形式有70多种，月利率在2.5%—6%不等，最高可达10%，一般于1984年、1985年就建立债务关系，甚至更早。“平会”较为常见的为“单万会”[④]，亦有少量的50万会、100万会。其次，还有“月月会”“大头尖”“千千滚”[⑤]等，具有涉及面广、时间长、利息一般等特点。随着“平会”的集聚，缺钱应会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替人借钱的“银背”。他们一般以2.5‰至5‰的月息借进，以

3‰至10‰的月息借出，坐得利差。会主和“银背”将先收到手的部分钱款占为己有，另外部分在此会与彼会、“平会”与借款之间封闭流转，形成会中套会、以会养会的形式，参与者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债务时间长且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会主若无法应会，便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批批会便随之倒塌，借贷关系也随之破坏。

1988年七八月间，“平会”“银背”及借款等一些民间金融信用活动全面崩溃，即乐清第二次民间金融风暴爆发。这场风暴积蓄已久，与“抬会”密切相关。据统计，“平会”债务总发生额达3.3亿元，债务额2.2亿元，净亏空1.1亿元。涉及范围遍布乐清20多个乡镇，并波及上海、杭州及邻近市、县，涉及群众15万余人，其中乐成、柳市、北白象、慎江、翁垟、黄华等六大集镇人数占75%。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平会”倒塌引起的民事、治安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众经常成群结队上访，党政机关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干扰。金融秩序的大混乱造成了生产资金的投放周转一度失灵，严重影响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秩序再度出现较大波动。

面对来势凶猛的第二次民间金融风暴，乐清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调处民间债务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吸取清理“抬会”经验教训基础上，根据“平会”倒塌特点，按照有关法律、政策和“特事特办”精神，迅速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针对受害人中有部分是公职人员的情况，1988年10月8日，发布清理“平会”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在民间信用活动中必须遵纪守法的若干规定》。25日，县政府又发布《关于整顿民间金融秩序的通告》，在依法追究债务人刑事责任及所负债务责任的同时，提出债权人平等原则，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按统一办法清债和分配债务。11月13日，县政府成立整顿民间金融秩序联席会议，下设政策指导组、来信来访接待组、刑事专案协调组和公职人员违纪处理组，加强对“平会”清理工作的宏观指导。之后，“平会”清理整顿在全县全面展开。

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县委、县政府积极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政府指导下理顺债务关系，处理债务纠纷。1988年12月1日，根据“自我就地”清理原则，乐清县批准建立了39个民间清债组织，负责登记债权债务、理顺债务关系、处理债务纠纷。至1990年底，全县民间清债组织发展到286个。同时，县委、县政府也广泛听取有关部门、专家



全国新闻界纷纷著书刊登乐清县会案情况

意见，集思广益，反复研讨处理民间债务相关对策。1988年11月21日和1989年1月21日，县政府制定出台《关于清理民间债务暂行办法》和《补充规定》，对清债组织、债权人债务人的权利义务、清算、更账、清偿、责任及违法犯罪行为处理等作出明确规定。1989年1月26日，县政府作出变卖债务人房产的规定，对债务额较大、到期又不能偿还的债务人责令变卖房产还债。同月，县委、县政府组织统一行动，对态度顽固、侵吞大量会款、拒不清退的“平会”会主，以及干扰破坏清会工作的行为和个人进行了严厉打击，共抓获对象115名。3月24日，乐清县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打击金融投机诈骗犯罪分子，认真整顿民间金融秩序的决议》。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及广大干部群众积极配合下，全县清理整顿工作进展顺利。

为加快推进清债工作，1990年上半年，县委、县政府组织3个检查团到各乡镇检查指导清债工作。据统计，接待上访共7000多人次，协调解决跨县区镇案件1000多起。其间，县委、县政府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清债工作商讨对策，几易其稿，形成方案。9月7日，县委、县政府批转县整顿民间金融秩序联席会议《关于深入清理民间债务若干问题报告》的通知。《报告》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对清债机构和政策规定作了适当调整。25日，县委决定成立调处民间债务领导小组，下设打击协调组、违纪党员和公职人员处理组，建立房产变卖委员会。有“会案”的区镇乡均成立清债办，并配备专职干部为群众解决复杂问题。《报告》下发以后，全县清债坚持“群众自清为主，政府指导为辅”和公平偿还原则，采取“清账、打击、破产”三项并举，“行政、法律、经济”三种手段齐用，使整个清债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10月29日，县变卖房产委员会作出《关于变卖债务人房产暂行规定》，并于12月11日首次批准变卖债务人4座房屋。变卖房产推动了整体债务的清退。至1992年7月4日，全县经变卖房产委员会批准变卖房屋计85间，债务人自觉变卖计800余间。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平会”倒塌引起的混乱

局面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受干扰的各项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至1992年7月，乐清基本平息了第二次民间金融风暴，全县共清退债务1.54亿元（其中现金1.1亿元），占这次风暴总债务额的70%，大部分债权人得到了偿还。在这次风暴债务清理中，政府“帮而不包”，调动了债权人自我清理的积极性，使清债工作长期保持强大的力量和声势，追根究底，步步深入，斩断债务链，层层还债。广大群众在自我清理中也得到深刻的自我教育，逐步认清搞会牟利骗钱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投机诈骗属性。

20世纪80年代乐清发生的两次民间金融风暴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发生的大事件。在当时法律、法规、政策均无针对性具体规定，又无外地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乐清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以积极态度、求实精神，勇于探索、深入调研，成功平息了连续发生的两次民间金融风暴，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民间聚会，或叫呈会，在浙南有着悠久历史，它由若干人自愿组合，每人定期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集中起来依次交一人使用。组织聚会的会主，最先无息收用，然后按照契约规定的顺序，各人轮收一次，利率低于民间借贷而高于银行，有的自用，有的放贷。多是亲朋好友之间基于情义、互助互济的融资形式，同时也有调剂余缺、互惠互利的作用，一般有较好的信誉，在民间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②“抬会”：“会”意指民间聚会，“抬”意指哄抬，其会款利息不受制约，越抬越高。“抬会”会规公开，愿者上钩。

③“四个有利”：有利于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团结大多数；有利于发展乐清县的大好形势，特别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正常融通；有利于稳妥而有秩序地解决“抬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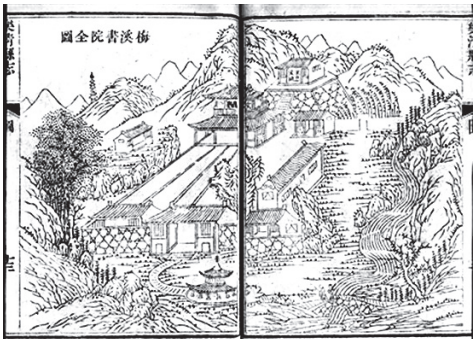
④“单万会”：由会主邀请10名会员，共11人组成，每半年为一期，第一脚每期应出1500元，之后每脚依次减少100元，到第十脚只须应出600元。首期由会主收取，之后各期依次由会员收取，收者均为10500元，5年半结束。

⑤“月月会”，100元还150元；“大头尖”从1500元至600元依次递减；“千千滚”，1000元还2000元。

梅溪书院：振仲尼文教之鸣

◇ 全定旺

梅溪书院由南宋王十朋创建，旧址位于乐清左原（今梅溪村），是乐清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书院被后人多次重建，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因梅溪书院的存在，乐清学风日盛，名士辈出。



梅溪书院全图

一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乐清左原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应殿试，中进士第一，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仕宦历程中，二任帝师，四任知州，后因病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叶适称他“名节为世第一，士无不趋下风者”。朱熹则称：“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心，无不敛衽心服。”王十朋学识渊博，擅长诗文，曾作《尚书》《春秋》《论语》讲义，有《梅溪集》。



梅溪书馆

关于王十朋梅溪开馆的时间，《梅溪集》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绍兴十三年（1143），《梅溪题名赋》小注说“予癸亥秋辟馆聚徒”，《大井记》又说“绍兴癸亥，予辟家塾于井之南”；另一种说法是绍兴十四年（1144），《送吴翼万庠赴省

试序》说：“绍兴甲子，予辟馆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师席见推。执卷而从者四十人。”据学者考证，当以第一种为准。

梅溪书馆落成后，最初游从者10人，不久，又有因仰慕王十朋而从台州、安徽和山东等地慕名而来的学子。徐炯文《梅溪王忠文公年谱》便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有远近之名士，游学梅溪。王十朋曾作诗：“罗生黄山来，从我梅溪游。齿鬓最年少，学问能自修。”几年后，书馆声名广播，游学之士众多，至122人。《宋史》亦载王十朋：“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

据许宗斌考论，从绍兴十三年（1143）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王十朋除了赴临安太学和应礼部试，基本都在家乡讲学。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他又在明庆寺开书会，直至秋天。随后王十朋在南山脚下的郭路庄另建别业，自绍兴十六年（1146）开始补太学，至此正好十年。他在《题郭庄路》诗里说：“十年太学志未遂，归来陇亩躬桑麻。草庄新筑亦不恶，青山远近光交加。”王十朋尽管有归隐之念，实际则另有所托，他在同时期的另一首诗里说：“林泉欲共高僧老，事业未容吾辈闲。”

明庆寺书会是梅溪书馆的延伸，在结束书会后不久，王十朋便赴临安太学。第二年春，他以太学上舍生的身份高中状元，此后走上仕途。其梅溪开馆也改变了一大批乐清学子的命运，影响了后世乐清的书院教育。

二

王十朋梅溪讲学志在“振仲尼文教之鸣”，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他教育学生以“明一贯之道”为目的，反对一味“读纸上语，工文词，取科第”，如其诗云：“读书不知道，言语徒自工。”王十朋这一观念源于其认为取士应“先器识而后文艺”，他说：“古之取士先德行，后之取士尚文艺。”故王十朋以儒家的道德、礼义教导学生，其自身对儒家经典亦有很深的研究，凡四书五经皆一一讲授，尤擅长《春秋》。《宋元学案》中说：“先生之学，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韩文公、欧阳公、司马公是师，故其文粹然。”

二是倡导教学相长的方法。对于韩愈《师说》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王十朋“初

怪其言，谓师者人之模范，宁有不弟子如耶？”然而讲学过程中，他发现学生间“颖然以才名称者十余辈，齿颊锵锵，类能道惊人语，予疏缪，反资其发药者居多”，然后知韩退之所言不妄。梅溪书馆的学习气氛也很好，师生之间亦徒亦友，周仲翔诗云：“梅溪辟家塾，辱与英俊游。回首五年旧，子独终始周。”周仲翔是河南汝南人，曾为其学生，王十朋与之交情甚深，后又聘为西席教他的儿子读书。他在诗中说：“与子十年同把酒，贫贱未能离陇亩……老来钟爱有三儿，迩岁从师得吾友。”

三是注重学习氛围的培养。王十朋主张寓教于乐，除了室内讲学，还经常带领学生游山揽胜，在大自然中怡情养性。他说：“文章风月须兼美，莫使时人恨海棠。”如绍兴二十年（1150）孟秋，雨后梅溪村南的大溪水位猛涨，他与学生一起去观水之时，曾引经据典设疑：“孟子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诸友今日之观，其有得于水乎？”此情此景，使人联想到《论语》里曾晳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四是通过诗文培养学生的志气。王十朋继承了传统文主气的思想。他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说：“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他认为孟子、韩愈之文能“杰然自名于世”，皆因“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两者都以刚气主其文，王十朋将其视为文章的内在精神。在书馆教育中，他采用诗友会讲、吟诗作赋等形式，培养学生胸中的这种“浩然之气”。

三

王十朋殁后，朝廷追谥忠文，并敕建祠堂，后于祠堂旁建讲堂，毁于何时不明。明嘉靖初，知县潘潢改东岳庙，祀梅溪，并在两旁设书塾，令诸生肄业其中，后因修筑城墙而毁。明隆庆年间，知县胡用兵重建。

雍正六年（1728），知县唐传鉎景仰王十朋，改长春道院为梅溪书院，并置塾田九十三亩以赡士，膏火充足。正堂祀梅溪，内设讲堂、藏经阁等。经唐传鉎改建，梅溪书院成为规范的官办书院。同治元年（1862），院舍毁于太平军兵火。同治三年（1864），在徐德元等士人协助下，知县舒时熜重建梅溪书院，延

请名师。

从雍正六年（1728）梅溪书院建立山长制后，可查到名字的山长有13人，如徐炯文、陈舜咨、张振夔、蔡保东、陈黻宸等，他们学问扎实，各有所长。曾在梅溪书院求学的高谊，其《梅溪书院教学记》云：“百余年间，其院山长聘自他县及邑人士，故皆一时之彦，有名于世，从游之士，院舍恒充塞。”

其中，首任山长徐炯文，长于经学，著有《诗义》《翔云经义》《春秋韵语》等书，探讨义理，涵演贯通，太史周长发称“其文光明磊落，绝类王梅溪”。梅溪书院落成后，唐传銑寻访名士掌教。此时，徐炯文已“声名日盛，学者咸师尊之”，故地方人士多推荐。后来，他作为梅溪书院山长考取岁贡，“得竖旗匾于宗祠”，对乐清的学风转盛有很大影响。

陈黻宸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一位重要人物，与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赞其“文章之锐进，理想之烂斑，实本社记者所深佩”。他曾任《新世界学报》主编、京师大学堂教习、浙江谘议局议长等。民国时，出任众议院议员，兼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史学和诸子哲学，其中国哲学史授课在胡适之先。马叙伦、冯友兰等著名学者出自其门下。陈黻宸于中举前后，曾两度任梅溪书院山长，他在书院讲授经世之学，“言治史而于世运推移之迹，因革损益之故，夷夏文野之义，民生习俗之变，论之益备”，故使乐清之学风为之大变。高谊称：“当时乐清县境内通经明史者，十之八九出自梅溪书院。”

20世纪初，梅溪书院停办，后院舍不幸圮毁。近年，乐清梅溪村修建了梅溪草堂，亦有不少学人呼吁重建梅溪书院，以纪念先贤和传承文化传统。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钱会南征始末

◇ 胡进士

金钱会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浙江四大农民起义之一。

咸丰十年（1860），赵起等人在平阳成立金钱会。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率会众攻破雷渎温家团练和潘埭孙家安义堡后，于十月初一在瑞安沙垟宫大聚会众，决定分兵北攻瑞安、温州，响应入浙太平军花旗部队；南下攻占福鼎县城桐山，以扼闽浙咽喉，阻挡援浙闽军，并解决物资供应问题。

同年十月初，平阳江西垟金钱会众2万余人从夏姑桥出发，南征福鼎，先后3次攻入县城桐山。咸丰十二年（1862）一月二十日，金钱会南征部队在清军秦如虎部追剿下，于灵溪全线溃败。一月廿八日，秦如虎进抵萧家渡，沿江烧杀至夏姑桥，金钱会江西垟根据地被全面清剿。

金钱会北攻的历史，有黄体芳《钱虏爰书》、孙衣言《会匪纪略》等文字材料记载，较为详尽，而其南征的历史却鲜有记录。《平浙纪略》一字没提，即便是《会匪纪略》、民国《平阳县志》，也只有“九月，贼分党破福鼎”“二十九日，秦如虎兵至萧江渡，尽焚濒江贼巢，生擒贼首谢公达”等寥寥数语，有关史实只在江西垟民间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中流传。笔者现将有关史料进行整理，并与《咸丰十一年浙江平阳金钱会案》（以下简称《会案》）、民国《福鼎县志》相关资料互相印证，供大家参考。

金钱会南征背景与夏姑桥据点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初，太平天国李世贤部入浙，连克常山、江山、开化，于五月二十八日进据金华，开拓浙西、浙南基地。九月，李世贤分兵占领宁波府境，亲督大军克复处州（今丽水）、台州两府。受太平军入浙的鼓舞，“平阳金钱会匪裹胁日众，势渐披猖”。与温、处两府相邻

的闽省福宁府尤为敏感，福鼎为省会北路藩篱，与平阳犬牙相错，而福宁府属之寿宁一县，又与处州毗连，相距省城均止数百里，情形实为紧急。闽浙总督庆端调集闽军，准备兵援浙江。高南英《记匪患》载："至咸丰庚申、辛酉（1860—1861），江南、浙江两省地尽陷。吾闽与浙江为唇齿相依之地，恐其由浙入闽，制军（即闽浙总督庆端）奉上命，遣将提兵赶援。辛酉年（1861）九月初旬，大兵陆续抵福宁界，前军已至吾桐山地方，将取道温州。"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廿七日，金钱会在瑞安沙垟宫大聚会众正式举旗起事之后，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

其一，金钱会要想不被官兵和地方民团歼灭，并能发展壮大，就必须北上瑞安、温州，打通往西、往北通道，与台州、处州太平军会合连成一片；南下闽北，至少要占领闽浙咽喉福鼎，才能阻挡闽军援浙，否则闽军过了闽浙分水关，几乎无险可守，长驱直抵平阳。

其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金钱会大规模集结，正式举旗起事，物资供应便成了头等大事。道光、咸丰年间，浙南水灾、旱灾频发。仅咸丰三年（1853）至十一年（1861）8年间，平阳县就发生过7次灾荒，特别是咸丰十一年（1861）大旱，粮食欠收，民不聊生。灾荒之年，平阳江西垟、南港、北港一带人民离乡背井，南下福宁府福鼎、霞浦等地避灾躲难、迁徙谋生。《福宁纪事·浙省温处道带勇督剿并宁郡续获匪党讯明正法禀》一文称："惟霞浦辖各乡，寄居平阳县人，较之土著本有十之三四，或二三世，或数十年。"可见在霞浦谋生的平阳人数量之多。霞浦一带在当时相对平阳来说生存环境更好，粮食等生活物资相对较充足，所以，金钱会南征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获得闽北福宁府的物资供应。因此，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底，赵起遣项阿右率江西垟金钱会众2万余人南征福鼎。

金钱会南征队伍是在江西垟的夏姑桥出发的，夏姑桥是金钱会南征部队的根据地。小南垟的钱仓是金钱会的发源地，咸丰八年（1858）八月，赵起、朱秀三、刘汝凤等8人，在钱仓凤山龙虎岩后灵顺庙（俗称北山庙）结为异姓兄弟，咸丰十年（1860）五月正式成立金钱会。钱仓是个千年古镇，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但其腹地小南垟狭小局促，不利于发展，无法成为根据地，因此南征的后方基地，不

在钱仓，而在江西垟的夏姑桥（今属平阳县萧江镇）。之所以要选在这里，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夏姑桥所在的江西垟在鳌江南北两港的西侧，三面隔江，位置相对偏僻，不易引起官府注意，且江西垟腹地广阔，后方是南港山区和北港山区，有战略纵深，人口众多，可以保障人力来源和后勤供应。参加南征的会众，按《会案》记载有2万余人，大多来自江西垟。即便近在咫尺的江南垟湖前朱秀三部队，也是随赵起北上，没有参与南征。民国《瑞安县志稿》载："贼自攻城，被击毙，及是日被杀死、溺水死者约五千人，其死党所谓'兑'字号者，皆平阳江西悍贼，被杀尤众。"其言"平阳江西悍贼"实为江南垟湖前朱秀三部队，皆因湖前与江西垟萧家渡隔江相邻，部分会员来自江西垟而误会。金钱会的大本营设在夏姑桥垟心杨府殿，当地人称是赵起的"金銮殿"。因此，民国《平阳县志·温和钧传》称："贼踞夏姑桥。"高南英《记匪患》载："时适有平邑匪寇赵启等倡立'金钱会'，建八卦旗，到处荼毒、劫掠，八月间攻瓯城，不克。纠党数千人，聚在灵溪、夏姑桥等处，焚毁劫掠，无所不至。"

二是江西垟农村尚武而不重文，村村都有拳坛。江西垟历来远离县城中心，文风不倡，武风兴盛，群众总体上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封建迷信盛行，易受宣传鼓动并参与各类会道门组织和民间拳坛组织，是参与金钱会的主力军。这还可从江西垟金钱会首领项阿右发动村民参加金钱会的方法看出来。为扩大金钱会影响力，项阿右作了一个策划。一天夜晚，夏姑桥附近江边突然窜起一道奇怪的火光，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项阿右等人也过来了，说火光下面必定有"名堂"，于是叫人挖下去看看，果然挖出一缸铜钱，上面铸有"金钱义记"字样。项阿右掐指一算，念念有词："这是天意，分到铜钱的人就是兄弟，以后同患难共富贵。"这种在秦



"金钱义记"铜钱

末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两千年农民运动中几乎都能找到的类似招数，居然屡试不爽。一时之间，江西垟参加金钱会的便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会案》说：“萧家渡附近各村悉皆从贼。”

三是赵起从小在江西垟长大，对这里很熟悉，有群众基础。有关的历史资料都说赵起是“钱仓人，年三十余，设饭铺于其乡”。根据夏姑桥民间口述历史，赵起从小是在夏姑桥长大的，当地有许多赵起年少时生活过的痕迹，还有很多关于赵起的故事。至于赵起为什么在夏姑桥长大，有多种说法，有说是赵起小时候随母改嫁到夏姑桥，有说是赵起一出生便丧母而寄养在夏姑桥亲戚家。赵起小时候住在夏姑桥北岸边，当地人叫他“桥底起”。他小时候跟人学打铜，铜铺在夏姑桥南岸桥头边。桥头边原来有个水坑，本地话叫“火炭井”，是赵起打铜时淬火用的水坑。赵起在江西垟朋友众多，如项阿右、胡盛槐等，后来都成了金钱会南征的骨干。

金钱会南征首领

《会案》中提到的江西垟金钱会首领或骨干有项阿右、章阿笑、刘森然、刘瑞瀛、陈大坤、郑卿材、王声三、林有足、林有琴、林新亩、周阿岳、林志承等人。章阿笑号“五显神”，刘瑞瀛即赵起北山庙结拜“八兄弟”之一的刘汝凤，林有足是金钱会南征军师，林有琴是林有足之弟，刘森然原系平阳右营额外外委，郑卿材系平阳县学附生，王声三由附生报捐贡生，以上人员具体生平不详待考。

（一）总指挥项阿右

项阿右（1819—1862），又名项继楼、相楼，夏姑桥附近后垟村项店自然村人。在江西垟民间历史记忆中，项阿右是仅次于赵起的金钱会首领，在《会案》中也明确提到项阿右是金钱会的军师，在攻打雷渎和南征福鼎时，是重要谋划人和实际指挥者。

但令人不解的是，《钱虏爰书》《会匪纪略》《钱匪纪略》均不见项阿右名字，在吴一勤《书逊学斋〈会匪纪略〉后》一文中，却说：“（金钱）会首谢公达等焚雷渎温氏。”胡珠生著《温州近代史》亦称：“金钱会谢公达等率众六七千人由灵溪前往福鼎。”

据孙衣言《会匪纪略》、刘祝封《钱匪纪略》，谢公达为金钱会结义八大首领之一，但其身份不详，既不知何处人氏，亦不知是何职业。若谢

公达确系攻打雷渎的金钱会首领，雷渎温氏族人应恨之入骨，但温氏族人的口述历史并未提及谢公达其人，江西垟金钱会驻地夏姑桥也无人知晓谢公达，却很明确项阿右是金钱会攻打温家团练和南征福鼎的首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案》中收集了闽浙总督庆端、福建巡抚瑞瑸（后为浙江巡抚）、福建巡抚徐宗干等关于征剿金钱会的战报奏折15篇，记录了从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至同治元年（1862）八月，闽军从福鼎、分水关、桥墩门、灵溪、萧江渡、钱仓、平阳城，一直进军至瑞安、温州，剿灭金钱会的一线战事，均未提到谢公达，但明确记述了项阿右等人被擒经过。

倘如孙衣言《会匪纪略》等资料所言，谢公达被擒这等大事，庆端、秦如虎在奏折中焉能不提？可以推断，谢公达与项阿右应是同一人。项阿右所在的夏后垟村大多都是姓谢和姓项，项阿右化名为谢公达也很正常。黄体芳《钱虏爰书》所载："廿九日，总兵秦如虎率兵至萧家渡，焚瀫江一带贼巢……生擒贼首谢公达，解之闽。"孙衣言《会匪纪略》所载："二十九日，秦如虎兵至萧江渡，尽焚瀫江一带诸贼巢，生擒贼首谢公达。"与雷渎温氏族人所述："垂鼎即回家，带族丁二百余人，向三十三都垟心殿，捉住伪军师项阿右、假五显神章阿笑，于廿九日辰刻，械送秦营正法。"二者被擒时间相符，亦足说明问题。

《会案·闽浙总督庆端为报平阳金钱会众已被荡平事奏折》称"三十日秦如虎派员擒获伪军师项阿右一名"，实为庆端在一个多月后奏报之误。《会案·闽浙总督庆端为官兵克复平阳县城并接战情形事奏折》："二十九日据报通贼之郑卿材、王声三潜回夏姑桥等处……当将郑卿材、王声三拿获。"《会案·福建巡抚徐宗干为审明金钱会项阿右等分别从重拟罪事奏折》："嗣闻官兵复来搜捕，郑卿材等四犯畏惧走避，项阿右起意抗拒，招聚余匪各持刀械迎敌，项阿右杀死兵勇三人，章阿笑杀死兵丁二人。"都对项阿右等人被捕情况有提及，尤其是项阿右、章阿笑拒捕时特别英勇，当场杀死了5名来捕的兵勇。

另刘祝封《钱匪纪略》言："至十月，江南保首与先锋许游击接仗，许失利，被围不得脱，弃马而走。马为保首所获……后匪首谢公达乘此马出战，闻大营号声，飞跑而去。公达

不得下马，俱被获，悬首军门。”胡珠生《温州近代史》也采纳了这个说法：“谢公达于此役前后被俘牺牲。”其实这种说法类似演义，不可信。此说法疑源自《闽浙总督庆端为报官兵在泰顺瑞安等处与金钱会众接仗情形事奏折》所载，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日闽军进攻灵溪时，“戳毙穿红袍骑马贼目一名”，但奏折中并未确认毙者是何人。

至于项阿右被俘后怎么死的，民间传说是被剥了皮，抹上菜油，卷在篾簟里烧死，江西垟土话叫做“捋油砖”。据说项阿右疼得上下直跳，因而江西垟有“跳起来阿右恁”的说法。而《会案》中说项阿右在狱中病死后被剉尸。尽管说法不同，都可以看出项阿右是死在极端的酷刑中。

（二）先锋胡盛槐

胡盛槐（1831—1862），又叫胡横，住夏姑桥南岸。他比赵起大1岁，二人是少年朋友。胡盛槐从小就体壮力强，为人慷慨豪爽，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大，在族内有很高的威信。他带领族人成立了一支36人的“护村队”，用挑柴用的两头尖的“捻担”当武器，被称为“胡家三十六根捻担”。

胡盛槐是“三进桐山”即三占福鼎城的领队人。他生性勇猛，曾在钱仓码头孤身一人把来敲诈的“埠头帮”十几人打得服服帖帖。参加金钱会后，在与白布会的几次冲突中，胡盛槐和他的团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于是金钱会南征时，胡盛槐负责“打头阵”，担任先锋。胡盛槐带领先锋队在每场战斗中冲锋在前，并负责突击任务，三次突入福鼎城。第三次攻入福鼎城时，发现是座空城，知是中计，但已来不及，被死死地围在城中，于是率众人奋力突围。战至最后，发现身后已无一个弟兄，遂凭自己的勇武，抓起一杆旗杆横扫开来围的闽军，单枪匹马冲出城来，与其他溃退部队会合。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廿四日，灵溪之战全线溃败后，胡盛槐逃回夏姑桥。十二月廿九日，秦如虎兵至夏姑桥，胡盛槐被捕，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八被杀害。胡盛槐虽然勇猛，但毕竟是一介武夫，并非金钱会核心人物，其事迹只在夏姑桥胡氏族人和周边村老人口述中流传，《会案》中没有提及其名字。

（三）军师林有足

林有足，与其弟林有琴一起参加金钱会，林有足为金钱会南征之军师。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日，金钱会退守灵溪，被秦如虎再次

击溃。金钱会军师林有足及其弟林有琴等23人被俘。有关林有足在金钱会中的具体活动情况不详，但有意思的是，林有足、王声三2人被俘后，居然得以脱身，成为后来闽浙红布会的首领。

据《会案·福建巡抚徐宗干为审明金钱会项阿右等分别从重拟罪事奏折》载："郑卿村[材]、王声三、林有足、林有琴均依听诱被胁，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林有足、王声三等4人被捕后判发遣新疆，遣前监禁在福安县狱。

据传林有足在福安县监中未发遣已被害，监狱也有验收在案，而实际上林有足、王声三后来成了红布会主要首领。《福宁纪事·卷一·平泰会匪林正候林汝谐等聚众盘踞阴蓄异图报复禀》等文中有载："据鼎邑绅者陈国璋等联名赴府具呈，溃回余匪，推拥金钱案内林友（有）足、林正候、王声三、项求院、黄正象、陈作梅等，啸聚数千，踞泰之虎垟、底垟及平阳各僻乡，制造器械，图谋不轨，声言本秋定欲大举各等情。"《福宁纪事·卷一·附福鼎县陈令禀》："本月二十一日（1864年7月24日），据岁贡生施浩然等佥禀称：'窃鼎邑自遭会匪滋扰，民苦异常，虽经大军过平剿复，而余党仍未尽歼，致本年五月间郡城告警，与福鼎连界平阳之五岱、麻垟、南宋垟，泰顺之虎垟等处，又复聚众窥伺。且金钱会案内巨魁林友（有）足、林正候、王声三等盘踞其间，制械煽众，城厢内外展次惊惶，纷纷迁避。'"

对此，程荣春在《福宁纪事·卷一·十九至二十四日办理会匪情形并续获股首黄高联等就地正法禀》也提出了疑问："复查林有足系前获金钱会匪，案内解闽，拟遣匀禁福安县监，旋据福安县详报监毙验收有案。现在是否传言错误，抑另有同名之林有足其人？"

林有足、王声三等人如何逃出监禁，成为红布会首领，继续谋划起事，这是一个谜。

金钱会南征经过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十九日，赵起、项阿右等率金钱会众歼灭雷渎温家团练后，于八月廿七日在瑞安沙垟大集会众正式起事。探得援浙闽军已抵福鼎县城桐山，于是派项阿右率江西垟金钱会众分兵南征福鼎。从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出征至咸丰

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1862年1月28日）秦如虎兵屠江西垟，不到4个月时间。其间，经历了浙闽边界攻防战、三占福鼎城、败溃江西垟三个阶段。

（一）浙闽边界攻防战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项阿右率众从夏姑桥出发，南征福鼎，至十月十五日，在浙闽边界的桥墩门、分水关与援浙闽军短兵相接，共发生战斗5次，其中在分水关4次，桥墩门1次。

一战分水关，失利。九月初二，驻扎在灵溪的金钱会探知闽省派令都司许忠标带兵勇取道平阳援助浙江，于是分兵2000余人到分水关附近战坪垟堵截，不敌，退回。许忠标遂进军至桥墩门，与广东补用知县谢颖苏分扎桥北桥南。攻打桥墩门，先败后胜。九月廿九日，金钱会派会众六七千从灵溪进攻桥墩门，“许忠标、谢颖苏分路迎击，斩馘甚多。许忠标三战三捷，追杀十余里，复毙贼二百余人，割取耳辫数十副”。金钱会初战不利，伤亡惨重。后金钱会大部队四面包抄，清军败退，许忠标身受数伤，金钱会反败为胜。闽省福宁总兵陈韶舞只得令各部退守溪扛桥、贯岭、分水关等处，谢颖苏部扼守清水壑要隘。

二战分水关，失利。十月初四，桥墩门胜战后，金钱会乘胜进军，分三路攻打分水关。闽军福宁总兵陈韶舞一面派兵在朱杜洋、半山分头埋伏，一面派罗源营千总马步洲出分水关大口迎战，自己与谢颖苏领队作后应。次日五更，两军在分水关激战。清军占据有利地形，以大炮轰击会众。金钱会支撑不住，只好暂时退守桥墩门。

三战分水关，不克。十月十五日，金钱会再次攻打分水关，并分兵抄小路从水北溪隘口直接进攻福鼎县城，但均未能突破闽军防线，只好再次退守桥墩门。

（二）三占福鼎城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攻入福鼎城，至十一月廿六日水北溪之战大败，金钱会三次攻进福鼎县城桐山。民国《福鼎县志》记载：“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浙江平阳金钱会匪由分水关入。寇陷县城，焚毁城内外三千馀家，惟文武衙署、文武庙、书院、考棚等幸免灰烬。次日，贼闻平阳义民有白布会者袭破其巢穴，惧而回援。时文武官兵俱弃城遁，贼闻地方无官守，稍稍复至各乡。妇孺逃匿无门，贼众驻鼎十馀日，掳人索金无数。十一月十九日，

前闽安镇（应为陕安镇之误）总兵秦如虎奉檄来剿，驻节桐山。二十八日，贼大至。如虎以师进驻水北，遣游击许中标为前锋，与贼战于万古亭，大破之。”金钱会“三进桐山”一直在江西垟民间口述史中流传，经与民国《福鼎县志》《会案》核对，其事件经过高度吻合。

一进桐山。金钱会几次攻打分水关不克，意识到靠强攻不行，于是设法在福鼎城内取得内应，内外夹攻。十月十八日，金钱会再次集中力量，分四路进攻，其中三路三面包抄分水关，另一路经小道偷袭福鼎县城。攻城前，联络在福鼎城内的金钱会会员，凡入会者门上用木炭作黑圈记号，以便内应。闽军福宁总兵陈韶舞等率兵勇截击。金钱会攻城先锋队在当地会员带领下，由小路攻入县城桐山。金钱会进入福鼎城后，“劫军局，取库银，开禁门，出死囚”，并分股攻入白琳。这次福鼎城被攻占，直接导致闽浙总督庆端参革了福宁总兵陈韶舞、都司许忠标、补用知县谢颖苏、摄理知县沈晋等人。

二进桐山。十月十九日，闻报隶属白布会的杨配籛江南团练偷袭金钱会江西垟根据地，遂撤出福鼎县城回援。十月二十日，被参革的陈韶舞、许忠标等人趁机谎报：“贼见我军四面合围，弃城逃散……各军同时攻入，当将城池收复，追剿十余里，斩馘甚多，割取耳记发辫无数，余匪均由分水关而去。”闽浙总督庆端令即补道曾宪德：“查明福鼎是否实已克复，禀复核办。”十月二十四日，金钱会在回援江西垟途中，得知杨配籛并没进攻江西垟，根据地没有危险，于是又返回福鼎县城。在县城驻扎20多天，觉得城墙又矮又窄，无垛无门，无险可守，于是留部分人马守城外，又移驻分水关一带。

三进桐山。金钱会占领福鼎城近一个月，这是金钱会南征的高光时刻，但危险也很快来临。十一月廿一日，总兵秦如虎督率诸军进驻白琳。十一月廿三日，秦如虎督军驰抵石湖桥，逼近福鼎县城。闽军署泉州城守营参将祥奎从福鼎城小南门攻入，金钱会驻分水关大部队未能及时赶赴桐山支援，金钱会守城部队寡不敌众，被毙数十人，余众出北门撤退，至水北溪与来援会众会合。秦如虎率兵追至水北溪，会众“死力拒敌，鏖战两时之久”，损失数百人，退至分水关。秦如虎遂在水北溪筑垒扎营，清肃会党。十一月廿六日辰时，驻分水关金钱会众反攻水北溪，并再次分兵

由小道偷袭福鼎城。反攻部队在水北溪中了埋伏，鏖战三时之久，终大败，阵亡数百人。当时秦如虎站在山上观战，说会匪军摆的是一字长蛇阵，头好、尾好，攻不进，只有“七寸”软弱，须打“七寸”攻进去，让其头尾不能相顾，便可全歼。于是派兵埋伏在万古亭岭下竹林中，用洋枪截路射击，金钱会中伏后仓皇应战，大败。而偷袭福鼎的部队第三次攻进福鼎城，却发现是一座空城，知是中计，但为时已晚，被围在城中全歼。秦如虎乘胜追击至分水关，金钱会败退至桥墩门，部分会众溃散至泰顺。

（三）败溃江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廿六日水北溪大战失利至十二月廿九日闽军进抵萧家渡，经历了桥墩门、灵溪两场战斗，秦如虎兵屠江西垟，金钱会南征部队被全线歼灭。

桥墩门保卫战。金钱会南征部队在福鼎水北溪大败后，退守桥墩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862年1月16日），“秦如虎亲统各军进扎平阳之桥墩门，杀毙贼匪十余名”，金钱会败退至灵溪。

灵溪大决战。灵溪已是江西垟南面最后一道门户，如果失守，整个江西垟将是全线崩溃。江西垟金钱会只能聚集全部的力量，孤注一掷，在灵溪拉开决战。十二月二十日（1月19日），秦如虎派守备马云标率兵进攻灵溪，被金钱会“二万余人四面抄袭”，“蜂拥围裹”，闽军勇首李海、王全发“力竭阵亡”，“正在酣战之际，秦如虎督带兵勇驰至，并力围攻。鏖战两时，攻破贼卡，歼毙贼匪千余名”，“匪见势不支，纷纷逃窜，我军跟踪追杀，贼匪落水淹毙千余名”。金钱会军师林有足及其弟林有琴等23人被俘。十二月廿一日（1月20日），金钱会1万余人分四路反攻灵溪，并暗分一股由小道包抄。反攻部队鏖战良久，被秦如虎亲统督战小队枪炮环攻和马云标率马队两翼抄截击退，被毙2000余人，落河淹死不计其数。进小道包抄的会众被闽军把总胡荣击败，被歼100余人。十二月廿四（1月23日）金钱会再次组织力量，竭尽全力反攻灵溪。秦如虎派都司许忠标、守备马云标等率部由中路迎敌，守备陈子贵、把总胡荣在偏僻处理伏，其他部属等各带兵勇分为两翼包抄。金钱会反攻部队被突然出现的闽军伏兵截作两段，分别被合围，抵死拼杀，终不敌，被杀1000余人，被俘43人。会众惊慌四下逃散，落水淹毙者不计其数，余部溃回夏姑桥。

兵屠夏姑桥。灵溪决战失利后，整个江西垟已无险可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1862年1月28日），清军秦如虎部进抵平阳萧家渡，由雷渎人温垂鼎为向导，沿江烧杀至夏姑桥，“尽焚濒江贼巢”。一时间，夏姑桥两岸尸横遍野，成为人间地狱。秦如虎部在江西垟烧毁大量房子，纵兵劫掠，伤及许多无辜。正如高南英《记匪患》所言：“乃贼氛甫退，而大兵旋至，需索百端，肆夺无忌，民不堪命，莫甚于此！”金钱会江西垟根据地被清剿，项阿右、章阿笑、胡盛槐等首领被捕。至此，金钱会南征部队被全部剿灭。

金钱会南征失败，秦如虎率闽军迅速北上，导致北攻瑞安、温州的主力部队腹背受敌。同治元年正月初一（1862年1月30日），秦如虎部夜渡鳌江，攻克钱仓城。正月初三（2月1日），秦如虎部进据平阳城。正月初六（2月4日），金钱会瑞安金谷山营垒被记名道张启煊部攻破。在秦如虎部和张启煊部南北夹攻下，金钱会迅速走向溃败，赵起等人逃往处州求援太平军。正月廿九（2月27日），白承恩率太平军入温。二月廿八日（3月18日），白承恩在瑞安雷桥中伏牺牲。五月廿一日（6月17日），入温太平军与金钱会余部在瑞安战败，浙南金钱会起义彻底失败。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圣井山石殿：一座无砖无瓦无木的石殿

◇ 谢公望

在瑞安城西30多公里，飞云江中游南岸有座高山，因传说净明道教祖师许逊（俗称许真君）曾经在此炼丹修道，故名“许峰山”。又因山之巅有一终年不涸的水井，又称之“圣井山”。在圣井山之巅，有一座无砖无瓦无木的石殿，叫做圣井山石殿，于1989年12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圣井山石殿



许逊炼丹的圣井

据《瑞安市志》卷三十《风景名胜·旅游》记载：“圣井山石殿，又名许公祠，许府真君殿，祀许逊。位于圣井山的山坳内，全由石料仿木构雕刻而成。初建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明万历至清光绪间数次重建。”

另据瓯越文化丛书《温州名胜古迹》中对圣井山石殿的记载：“殿宇梁、柱、檩、椽、斗拱、山墙、屋面及殿内陈之案、床、凳等均用石料刻成，且位于圣井山之巅，故称圣井山石殿。南宋景定元年肇建，明万历年间重建，占地面积480平方米，建筑面积229平方米。平面依次由山门、石坊、前殿、后殿和左右厢房等组成，建筑格局对称，南北朝向。山门：‘单开间，重檐悬山顶，卷叶形吻。’阑额上题刻：‘光绪二十八

年（1902）冬重建。’牌坊：四柱三间，重檐悬山顶，鸱尾吻，明间石匾上刻有：‘万历庚子岁（1600）七月壬子吉日，住持僧募造’题记。前殿三开间，穿斗式梁架，悬山顶。明间金柱上刻有修理题记：‘康熙十七年（1678）孟秋。’正殿：三开间，明间抬梁式，次间穿斗式梁架。明间后金柱上刻有明万历时林元深等捐银修建题记。厢房：六开间，从门楣题记，知其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建筑群中精美浮雕颇多，并有明天启元年（1621）的石刻狮子和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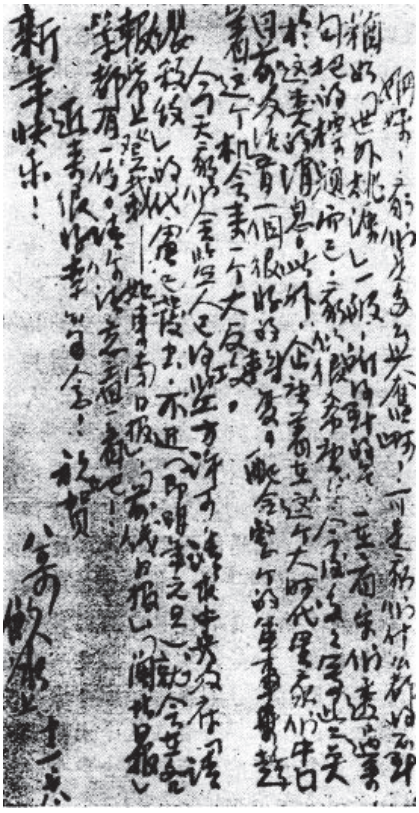
在石殿神座前石案桌下，有一口井，叫“圣井”。据民国《瑞安县志稿》记载：“井深、广不盈尺，经年不溢不涸。后改建，井底铺石板，井壁用石砌，深1米多，边长约0.7米。水质清冽甘甜，水位能随潮上下，故又名‘海眼’。宋元以来四周居民常来此井汲水或求雨。先贤木从龙在《许峰灵迹记》称：‘往岁每旱，躬跻恳祈，涸井泉涌，雨辄澍酷……余生不幸，逢旱干者七，幸而沐圣井之泽者亦七。’七求七雨，这是木从龙亲身向圣井许真君求雨的经历，如此灵验，显然许逊完全被神化了。许逊被神化的传说，最多的是圆梦，相传至圣井山石殿圆梦非常灵验。最有代表性的传说是张璁（俗称‘张阁老’，龙湾人，后官至内阁首辅）未出仕之前，到石殿圆梦时，梦见自己的眼睛被挖出钉在木板上。官居相位时到圣井山兴师问罪，半山腰被一老者拦住，问明来由，老者告之，‘木傍加目是何字？’张璁豁然大悟，并在圣井山半山腰建《感圣》牌坊纪念。”

圣井山石殿，因殿内有圣井，又因奉祀的许真君被神化而声名远播。近年，周边遍植千亩杜鹃花，每逢花季，这里成了花的世界，被游人称作人间仙境，成为温州市级风景名胜区。

〔作者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研究室）〕

一封英雄的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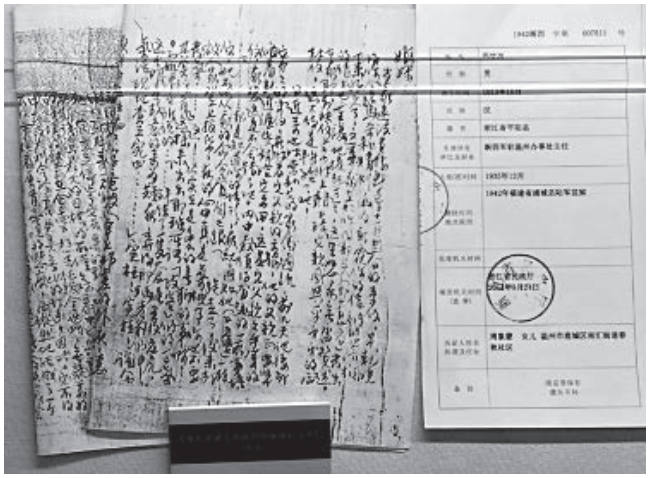
“姗妹！我们是多么兴奋啊！可是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所得到的唯一在看守们透过来句把的标题而已，我们很希望你今后多多写些关于这类的消息。此外，企望着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中国目前政治有一个很好的转变，配合整个的军事，趁着这个机会来一个大反攻。今天我们全监人已得监方许可，请求中央政府的‘请缨杀敌’代电已发出，不近（久）（即明年元旦）就会在各报纸上登载——如《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闽北日报》等都有一份。请你注意看一看吧！近来很好，幸勿为念！祝贺新年快乐！八哥饮冰上”。



这是周饮冰于1941年12月18日在狱中写给妹妹周珊珊的信。周饮冰，原名周涓，出生于平阳水头镇“周全昇”的大宅院，是民国时期大户人家的谦谦君子。成年后，周饮冰子承父业，在山门一带教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压得他透不过气，毅然投身革命。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温州城区九柏园头19号在鞭炮声中开了一家绣花店。明里是周饮冰一家三口的小本生意，暗地里

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指派的秘密据点，更是联通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跟党中央、新四军保持联系的重要枢纽。



是年底，一纸《国共合作宣言》打开了浙江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秘密据点由此成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周饮冰受命任主任，公开了党员身份。

抗日烽火燃起，周饮冰带领着温州通讯处，一边与国民党当局周旋，掩护省委的重要活动；一边以红十字会护送难民为名，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温州通讯处一度成为爱国者心中希望与进步的代名词。

可“希望与进步”在突袭的查封中戛然而止。1938年10月10日清晨，一大批军警破门而入。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根据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的密令，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借口，查封并逮捕了在场的临时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和4名工作人员。

外出办事得以躲过一劫的周饮冰闻讯后，明知凶多吉少，仍毅然告别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幼女，穿上新四军军服前去抗议。司令部中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新四军通讯处是国共承认的合法组织，为何无端抓人？我要求你们马上放人！”结果，周饮冰也被无端扣押，后辗转江西上饶、福建浦城，再也没能走出牢狱。

半个月后，他的妻子蔡玉莲生下了小女儿。国民党当局再次前来搜查讯问时，五岁的大女儿周象蒙亲眼看到“刽子手”将刚出生的妹妹用力甩出窗外，耳边似乎仍回响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尽管后来，听说当时守在附近的同志及时将妹妹抱走，偷偷送到育婴堂去了。但她们再也没能找回那个孩子，至今不知道她是否能幸运地活下来。

狱中的周饮冰得知此事后，含

泪在家书写道：“只要国家民族有前途，我们个人的生活才有出路。”

1939年春，周恩来到上饶探望周饮冰等同志。1939年底，周饮冰被押至福建浦城镇第三战区临时军人监狱。1941年2月26日（除夕夜）12时，在监方官戒备懈怠时，周饮冰组织越狱，逃出20多人，但他自己未能越狱成功。越狱行动暴露后，周饮冰、刘辛夫被狱方提审，任凭狱方严刑拷打，他们坚而不吐实情。

1942年6月，浦城的监狱准备迁往沙县，为了便于搬迁，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第三战区警备司令部以“组织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将周饮冰判处死刑。周饮冰在绑赴刑场的途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29岁的周饮冰壮烈牺牲，至死，他的膝盖没有向敌人弯曲过。

民族危难之时，他弃笔从戎，毅然投身于革命。他的家成了新四军通讯处，为营救被捕的战友只身闯虎穴，在狱中面对严刑仍不忘战斗，行刑前一路高歌宁死不跪……

穿越70多年的战火和阴暗的牢狱，英烈的遗骸再难寻觅，唯有那份铁铮铮的英雄风骨，在只言片语的文字里，流芳百世。

（文章来源：《红色宝藏 见证荣光——温州红色文物故事选》）

一张35年不离身的代表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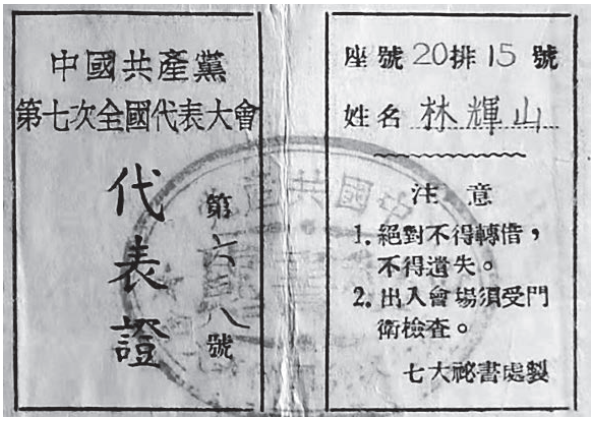
在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国家级革命文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以下简称代表证）。代表证长8.4厘米，宽6厘米，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也是紫红色，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整张代表证可以放在手掌心。代表证的主人林辉山，温州市苍南县赤溪镇人，新中国成立初任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后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温州平阳召开，大会选举刘英、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林一心、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等12人为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正式代表，林尧、谢廷斋等3人为候补代表。

1939年10月，浙江省党的七大代表动身出发，行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7个省，渡过严密封锁的长江，跨越崎岖的太行、吕梁，闯过了反动派层层封锁，经受了种种考验，于1940年12月16日到达延安，历时14个月，徒步行程1万余里。

因工作原因，龙跃、汪光焕、顾玉良未前往；丁魁梅因怀孕不便前往，由候补代表谢廷斋参加。途中，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代表团团长刘英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带领杨思一、张麒麟、郑丹甫3名特委书记回到浙江坚持工作。最后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谢廷斋4名代表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率领前往延安，并作为浙江代表参加了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赋予的光荣使命。

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他风趣地对代表们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



米，宽3.7厘米。它有宽、窄双缘，字序从右至左，上方为“中国共产党”，下方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是“秘书处”三个大字。

直至今日，林辉山的代表证仍被保存得很完整，这和林辉山的爱人姚欣华的细心呵护分不开。大会闭幕后，姚欣华专门订制了一个小黄包，为防止代表证折旧，她将代表证夹在了一个小本子里，放在小黄包内。

征……

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打开代表证，左边框内上方从左至右横书“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两行；中间竖写“代表证”三个大字；靠右侧有“第六三八号”小字。右边框内上方横书“座号20排15号”，“姓名林辉山”。下方横写“注意”，为“1.绝对不得转借，不得遗失。2.出入会场须受门卫检查”。落款“七大秘书处制”，共6行。而在内页中间靠下方的地方，盖有一个横椭圆形的红色印章，长5厘

此后，林辉山一直把代表证带在身边，视若珍宝。无论是在日晒雨淋的千里行军途中，还是在东北辽南的三年游击战场上，亦或是和平建设年代，整整35年，舍命保管的代表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直到他去世，代表证也没有一点受潮变形。林辉山的想法就是，万一自己在战场上牺牲，同志们可以把这张代表证交给当地党组织作纪念。万一自己在战场上被捕，代表证被敌人搜去，也决不隐瞒自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共七大的代表，即使为党的事业而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

（文章来源：《红色宝藏 见证荣光——温州红色文物故事选》）

“四战四捷”嘉奖令 功勋永不褪色

在乐清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个编号134–2–1的卷宗，内有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获得的诸多嘉奖令。其中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即1948年秋浙南特委因括苍支队“四战四捷”而颁发的嘉奖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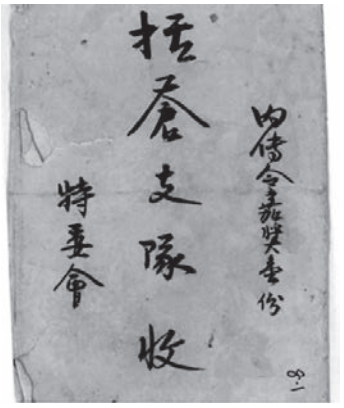
历经70多年时光，这张印有嘉奖令的粉红色毛边纸已略略褪色，纸边四边开裂，中间浙南特委大印章处有一条明显的裂缝，但是油印的手刻字迹隽秀有力，内容清晰完整。嘉奖令后面附有巴掌大的小信封，仍保有地下工作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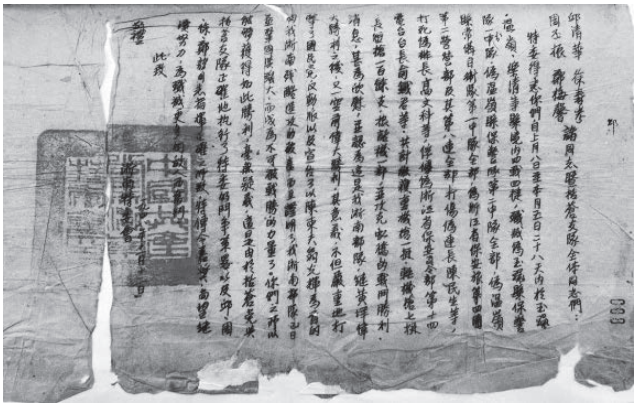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受此鼓舞，括苍中心县委和括苍支队决定在游击区扩大战果。

10月8日，括苍支队第三中队在玉环区委的配合下，于楚门小筠岗岭头，伏击了国民党新任县长毛芷熙的运枪队，也就是国民党玉环县保警队一中队。这是第一仗。

此后，周丕振带领警卫队两个班到海上巡视，与郑梅欣作出攻打岙隘的决定。岙隘是台州温岭的一座小集镇，镇上位于玉环楚门与温岭交界处的娘娘庙，驻有国民党温岭保警第二中队，四周围墙为石板结构。支队于10月12日夜出发，当突击组接近敌营时被敌哨发觉，组员随即端起机枪对着哨兵猛扫，其余战士边射击，边从窗口向内扔手榴弹，敌向后院败退。战士们举起铁锤将敌营窗下的石板墙砸开一个大洞，突击组迅速从洞中冲进，一阵射击之后，敌人丧失了斗志，举手投降。这是第二仗。

10月16日夜，参加岙隘战斗的原班人马自玉环县境出发，抵达温岭下风山敌军驻地，包围了国民党温岭县常备自卫第一中队。战斗于次日凌晨4时打响，大部分敌人逃出营房，沿庙前河塘奔跑。括苍支队队员用机枪扫射，敌人应声纷纷落入河中。突击队长周双峰带领陈俊、赵天林、陈才、谷定楣等冲进敌营房，战斗约5分钟，营房内部分敌人举手投降，部分越墙





出逃。这是第三仗。

11月4日，括苍支队召开由括苍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军事民主会议，制定了攻打乐清虹桥镇的作战方案，抽调100多人参战。部队于当天下午5时30分从山面出发，深夜11时左右抵达虹桥周家大院附近，立即分两路散开。战士们以稻田里的稻草堆为掩护快步前进，包围了周家大院。敌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激战随即开始。在机枪掩护下，突击队迅速穿插到大院北面后围墙下，挥锤猛击围墙，打穿了一个大洞。周双峰、周炳杰等突击队员纵身穿过墙洞，冲向院内，迅猛逼近敌重机枪阵地，几支二十响驳壳枪猛射，敌重机枪顿时哑火。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打乱后，惊惶失措，各自逃命，余下的全部被俘。这是第四仗。

四场战斗共计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7挺、长短枪100余支、报话机1部，并占领虹桥。

11月9日，周丕振、邱清华、郑梅欣率部在乐清雁湖上马石召开“东北重光”与虹桥战斗胜利庆祝大会。12日，浙南特委向括苍支队全体同志颁发上述嘉奖令，并认为：“这是我浙南部队继黄垟伟大胜利之后，又一空前伟大胜利……而且证明了我浙南部队已日益巩固与强大，而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了。你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胜利，毫无疑义，这是由于括苍党与括苍支队正确地执行了特委的斗争策略，以及邱、周、徐、郑（指邱清华、周丕振、徐寿考、郑梅欣）诸同志指挥正确之所致。”

（文章来源：《红色宝藏 见证荣光——温州红色文物故事选》）

为希望而生 为希望而死
——陈再华传略



陈再华，原名锡光，又名黄光，笔名白明，浙江平阳人。1933年，由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多次在广州组织文化团体，为上海中央党组织搜集情报。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陈再华，1904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鳌江镇。父亲陈仲芸先生是当地著名学者，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902年，他和几位地方士绅创办了鳌江公学。陈仲芸先生为人正直、思想开通、治学严谨，这些都给年幼的陈再华以深刻的影响。

陈再华6岁时入鳌江公学读书，毕业后于1919年就读于平阳县学堂。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第二年陈再华转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当他提前修完中学学业后，立即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但他对学校要他先读一年预科的规定很不满。因此，他只读了一学期就到上海，进入自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对哲学、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并立志将来要做一个革命的实行家。

1926年下半年，他在自治学院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

嗣后，他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后又于1927年去上海，入光华大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学习异常勤奋、刻苦，总希望自己学成以后，可以给人类社会做一些有益的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必须努力，人生必须认真。这念头、这态度，无一时无一刻不萦回于我的脑际，不表现在我的一举一动间。年华流水，一去永不复返，切莫等闲生活。”“我希望自己不是个懒惰者，

希望给人类社会做点有利的事。”陈再华在踏上社会后，始终按照他学生时代奠定的这一人生基调去身体力行。

1929年，他怀着极大的热忱来到广州，在培正中学当国文教员。他原以为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一座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那里的政治气氛一定非常活跃，自己来到广州定可以有一番作为。殊不知那时的广州正处在“南天王”陈济棠的统治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加之培正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多是豪门子弟，校内死气沉沉，这些都使他大感失望。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在培正中学，他尽自己所能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教育，如在讲授国文课时，努力阐明其中的积极意义。在讲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诗句时，就联系实际，并引申开来讲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以加深同学们的印象；他带领学生去三元里、沙面实习考察时，就联系“平英团”和“沙基惨案”的历史事实，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思想。陈再华在培正中学对学生所进行的教育，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激起了涟漪。他还一反当时所遵循的“师道尊严”，所以学生们都愿意和他接近，在课余或假日常去他宿舍，或听他谈论形势，或与他研究、探讨学问。他还把爱好文艺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培正文艺研究社，出版《培正文艺》杂志，自己担任顾问，同时也撰写稿件。

陈再华组织的文艺活动，逐渐从校内发展到校外。他联合现代创作社成立了一般文艺社，出版了四期《一般文艺》杂志。接着，他又组建新文艺评论社，出版《新文艺评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可惜这一期杂志刚印好，就被反动派查封了。他不甘休，又吸收绿天社的骨干，组织了新兴文艺社，出版《新兴文艺》杂志。他还把这些秘密社团组织起来，成立了争取言论自由大同盟，反抗当时的政府，呼吁争取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广州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开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广州的抗日戏剧活动蓬勃展开，这和陈再华的积极活动和组织是分不开的。他给中山大学的抗日剧社以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并帮助他们成立了左翼剧联广州分盟，作为领导广州抗日话剧运动的核心力量。他还在抗日剧社和新兴读书会的进步青年中，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苏维埃之友会，开展支持江西中央

苏区的募捐活动。有人曾问他，募到了东西，怎么运去呢？他笑笑说，目的不在于物资，而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宣传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东三省受侵略时，陈再华有感于国难严重，写作了一首题为《奋起救国》的慷慨激昂的歌词：

暴敌凭凌，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我劳苦民众士兵，莫不愤恨填膺。来，时机已逼，精诚团结，死里求生！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

暴敌内侵，神州濒于陆沉；闾里丘墟，林园灰烬。我劳苦民众士兵，陷于火热水深。看，时机已逼，唯图自救，团结一心。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

宁战死，不为奴隶忍辱偷生。民众士兵，一致奋起斗争，毋庸逡巡，毋恤牺牲，争取自由光明！

这首歌词由广州著名音乐家何安东谱曲，并灌成唱片。这首抗日歌曲比《义勇军进行曲》早三四年就风靡南方各地，特别是广州、香港一带，当时几乎人人会唱。

1933年，广州和香港等地自发地组织了许多文化团体。为了尽快地把这些群众性的进步团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陈再华和香港的进步人士黑炎、李拉特、陈光以及广州的潘皮凡等人共同商定，由他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广州、香港的文化运动和各团体组织情况的书面报告，利用他暑假回乡的机会，把这份报告带到上海，设法交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争取党和左联的具体指导。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这几个人，有些往时曾在‘组织’中工作过的，后来因为屡经拘禁、逃亡，便跟‘组织’失去联络……我们都立志委身于革命事业”，“我们也都知道团结是力量，文字是武器”。他要求“组织两地所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推进文化运动”。这年暑假期间，他就带着这份材料赴上海。这份材料被转到上海中共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十分重视这份很有见解的报告，经考察，决定吸收陈再华和潘皮凡为中共党员。陈再华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潘皮凡由陈再华单线领导开展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广东、香港一带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

陈再华回到广州后，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潘皮凡。他俩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把通讯联络地点设在香港，利用假日奔走于穗港之间；但是不到

两个月，潘皮凡的身份就暴露了，陈再华帮助他及时转移到上海。穗港的情报工作则由陈再华和另一位同志负责。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先后发展了10多位同志。1934年7月，陈再华再度利用回乡探亲的名义，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组织对他在广州的工作十分满意，肯定他们搜集的情报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他在广州搞得太红，会有危险，要他注意隐蔽斗争。党组织已考虑物色一名同志去广州接替他的工作。但在未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陈再华为了坚持那里的斗争，又急匆匆地赶回广州。

1934年10月前后，广州又有一批革命青年暴露了身份。为保护这些同志，陈再华通过组织把他们转送到苏联去学习，而对自己的安危很少顾及。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11月26日，陈再华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的时候，学校突然被反动派的武装包围，他无法脱身而被捕，被关押在广州警察局的监狱内。反动当局用尽酷刑逼他招供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情况以及在培正中学的同党。陈再华明白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谁只要和共产党人沾点边，往往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他巧妙地为培正中学的师生开脱，说“培正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无法搞活动，没有我的同党”。他入狱后，有一位美籍英语教师罗夫人出于正义感，代表培正的师生去探望他，陈再华对此很是感激，但他请罗夫人转告培正的师生不要去探望他，以免受牵连；并说他的事别人是帮不上忙的。警察局长何荤见他始终没有吐露丝毫实情，就亲自出马审讯，假惺惺地说：“你不愿意谈你们党内情况，我们也不勉强，君子不强人所难。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我们很爱惜人才，只要你表示愿意悔改，我们就可以从宽处理。”陈再华义正词严地回答：“我的行为光明正大，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应该悔改的，倒是你们自己。”敌人恼羞成怒，更加残酷地折磨他。1935年1月24日，他在广州黄花岗侧的荒坡上被杀害。

陈再华烈士遇难一星期后，反动当局才允许收殓。他的生前好友在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从江南特有的棉袍的布里子才确认出陈再华的遗体。陈再华的遗体还钉着镣铐，双手的指甲都已被拔去，可见陈再华生前以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共产党员特有的

钢筋铁骨承受着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当他的灵柩运回故里时，众多的乡亲怀着悲痛的心情伫立在江边迎候。他们为失去一个英勇的革命者，也为失去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政论家而痛惜。

陈再华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抒发他对革命对人生充满理想充满希望的诗篇。他曾在一首诗中抒发自己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

如今我才完全明白——
我是为着希望而生，
我是为着希望而死。
而我已空过了这许多日子，
希望永远还是希望，
而我将追求到死。

1934年夏，他重返白色恐怖的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已察觉到自己的处境极不安全，但是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继续坚守着工作岗位。在他被捕前的14天，曾写了一首题为《献给母亲》的诗，表达了他为革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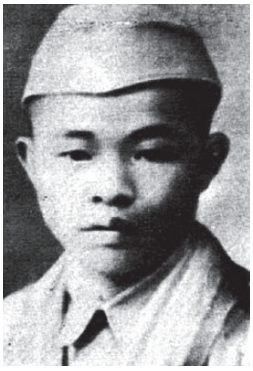
这是旧社会走到最末的一阶，
这是矛盾对立构成了稳健的新梯，
你的儿子就这样的朝前走了！
退后的，只是那些在火山口作骷髅舞的人哟！
退后的，只是那些哀号、流泪、屈膝的人哟！
母亲呀！他要永远地前行！
所有的母亲的儿子都跟着起来了，锄头、铁铲、阔斧、鹰嘴凿，
以及一切可以做我们武器的，都让它紧握在手里吧！
为着绝对的多数，
为着自己的子孙，
坚强地组织起来，
众人的血是流不尽的，
母亲呀，他要永远地前行！
……

陈再华还精通多国文字和世界语，曾翻译了许多外国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以激发中国人民的斗志。同时，他又是一位政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预感到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曾一再撰文呼吁制止战争，号召作家们“用有力的、挑战的、艺术的文字”来反对侵略战争。他所写的政论文章，文笔犀利、深刻，犹如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

陈再华牺牲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家和文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再华文拾》，此书收集陈再华烈士的著作、译作和书札，共10万余字。不料书印好后，遭到当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但是，正如革命

（86页〈下〉接此）

热血谱写青春的赞歌
——关榕传略



关榕，小名定龙，化名王一良，浙江永嘉县城区（今属鹿城区）人。1939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温州联立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瓯北县委碧莲区特派员、中共瓯北县委委员、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十一中队指导员和九中队中队长等职。1946年，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1946年春，温州监狱里押来了一名遍体鳞伤的“政治犯”，生命虽已垂危，而神态自若、坚强无畏。一天，他从流着脓血的伤口里取出了一块碎骨头，揩去了脓血，用小纸片包好，将它交给来送饭的弟弟，说：“你拿回家去保存着，作为纪念吧！”这“铁窗寄骨”的主人公名叫关榕，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壮歌。

关榕，1924年6月出生于浙江永嘉县城区（今属鹿城区）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父亲关泾伯，是银行职员，关榕共有兄弟姐妹8人，他排老二。1937年，关榕从城南小学毕业，次年春，考进温州联立中学（今温州第二高级中学）读书，与姐姐关少娴是同学。同年5月，关榕和姐姐一起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道理，还办刊物、出墙报、组织文艺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关榕曾写过一篇《论宪政》的文章，颇受进步师生的好评。文中写道：“日寇侵略，国难当头，我们要做民族解放的先锋！”关榕于1939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联立中学建立党支部，他担任书记，姐姐关少娴为组织委员。

1939年7月，日本侵略者的舰艇在瓯江口游弋，不断炮轰沿海城镇，

敌机也不断地对温州城区狂轰滥炸。党组织决定抽调原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成立学联工作队，到永强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关榕参加了学联工作队，他曾登上大罗山，挨村挨户地访问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关榕朴实敦厚，刚强坚毅，满腔革命热忱，受到同学的爱戴，被选为联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温州学联副主席。

七七事变3周年前夕，一帮年轻人在关榕家的厢房里，紧张地印刷、书写抗日标语传单，夜深人静以后，分头上街张贴、散发。市民们看到标语传单，大受鼓舞。但是，这些行为触犯了学校当局的忌讳，关榕等10多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

7月中旬的一天午夜，关榕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国民党派人来搜捕，立即对文件作了紧急处理。果然，警察闯进来就翻箱倒柜地搜查，后来他们从马桶里找到了一些浸湿的揭露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传单，并以此为罪证逮捕了关少娴和关榕。审讯时，姐弟俩理直气壮地质问：“难道爱国有罪？”警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警察和特务没有掌握更具体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初中学生竟是联立中学共产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姐弟俩机智应对，加以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关了两个月，两人就交保被释放了。

顽固派虽一无所获，但是总怀疑关榕姐弟同共产党有特殊关系。因此，将他们释放之后，仍然严加监视。关榕不能随便外出活动，同志们也不能来找他联络，他心急如焚。那时，报纸上天天载着“日寇进犯”“国军撤退”的消息，他和姐姐商量，决心离家出走，转移到永嘉西楠溪一带，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关榕通过弟弟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0年10月8日晚，他在自己的相片背面写了“国家胜于家庭”6个字，作为给亲人的临别纪念，然后悄悄地离家。第二天早上，他又设法接出姐姐，姐弟俩像出笼的小鸟，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党组织的工作安排。

后来关少娴回忆那次离家出走时说：“我和关榕是家里弟妹的大姐和大哥，我们都反复想过，出家容易回家难，此次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亲人。所以，临走前我俩都留下了自己的照片，我在照片背面上写的是‘我把这小照留给你们做永久的纪念！’关榕在照片背面上写的是‘国家胜于家庭’，当时我俩已有了为革

命献身的思想准备。”

关榕姐弟俩离家后，国民党县政府发出了通缉令。关父故意在《浙瓯日报》上刊登启事“望速回家，以免冻馁”，以示家中对他俩的去向毫不知情。

关榕姐弟在瑞安山区找到了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书记吴毓，然后被分配到永嘉楠溪沙岗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40年冬，关榕又被调到郑庄。当时，党内经济很困难，他在郑庄小学任教，一天只有一升米，这微薄的收入既要维持生活、又要接待同志，有时真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他身上长满了疥疮，加上常常在夜里奔走于山间小路，荆棘刺、露水沾，脚烂得更厉害，血肉淋漓。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吃尽天下苦、走尽不平路，为天下穷人谋幸福。”

由于关榕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党组织于1942年初春安排他秘密回温州家里疗养。母亲看到忽然出现在面前面黄肌瘦、双脚浮肿的关榕，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疼极了，说：“榕儿，别人说你走错了路，妈知道你不会干不正当的事，我就怕你太苦，太危险了！”关榕说：“妈，不赶走日本佬，那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得世世代代苦下去，这才真危险呢！”

1942年3月，中共瓯北县委成立，关榕担任碧莲区特派员。这时，他的活动范围为永嘉、青田、缙云3县的边境地方。关榕白天教书，夜里常常要跑很远的路，到各个支部布置工作。他在外黄垟教书时，每月的农历初二、十六两个晚上，都要到占背、万山、峰山召开党支部会议，每夜往返60余里路，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有一次，为下达党的紧急指示，他同陈鸣皆彻夜奔波，赶回外黄垟时，已经鸡啼天亮了。因为走得太急太累，关榕到了村口，面色十分苍白，还咯了血。陈鸣皆为他担心，他却坦然地说：“不要怕，没有什么关系的！”回到学校，他仍同往常一样，认真给学生上课。

关榕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抗日的需要，在1942年春节期间，叫陈渭生出面邀请万山、峰山、外黄垟地区18个村庄的23位中上层人士，举行了一次聚餐会，共商抗日、打土匪、保家乡的问题。通过协商，各村筹集资金，成立了一支有40余人参加

的抗日自卫武装。到1944年，这支民间抗日队伍增加到90余人。在日军侵占青田期间，他们曾夜袭青田石平川，砸了采钼矿的机械，把采掘出来的钼矿砂全部倾倒在溪坑中。日军抢夺钼矿砂不成，一怒便烧了附近几个村庄的民房，悻悻地走了。关榕为了用枪支武装民兵，取得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李文辉的同意后，在万山村自力更生制造军械。他们从仙居一带地方请来8位老师傅，利用从钼矿厂里拆来的钢材，制造了16支土枪。

1943年冬，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第十四督剿处在瓯北地区进行反共“清乡”。中共浙南特委江北办事处主任吴毓和瓯北县委组织部长徐顺性等遭杀害，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瓯北县委失去了与特委的联系。1944年初，县委决定派时任县委委员的关榕去找特委。他化装成小贩，翻山越岭，绕道丽水，到达青景丽地区，找到了特委书记龙跃，向他汇报了瓯北的工作。然后又把特委的指示带了回来，使得瓯北县委重新与浙南特委接上关系。

县委为加强和特委的联系，叫关榕设法开辟一条地下交通线。他和杨进尧、陈鸣皆、潘如楷等人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建立了江北大占村和江南西坑村两个交通总站，同时在万山、峰山、外黄垟等村设立中心点，形成了一条地跨瓯江两岸的地下交通线，再向东北方向延伸，直到县委驻地屿北村。这条长达三四百华里的地下交通线，一直使用到当地解放，而且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关榕曾多次亲自任交通员。他说：“交通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生命可以牺牲，党的机密不能丢。”

在反“清乡”斗争中，为防止意外，并应付突发事变，他每到一处，都很注意地形。有一天，县委通知在下家岙地方开会。关榕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从陈坑动身，不走大路走小道。在大山里走了两天一夜，行程数百里，中间只在一家住山户里吃了一顿饭。同志们说他是神行太保，叫他改名“神行”。他说：“骆驼可以几天不吃喝，照样走路，我要学骆驼精神，不达目的不停步，不如叫我‘驼行’吧！”

关榕机智勇敢、不怕牺牲，人们说他是一员为民除害的猛将，叫他“王猛”。有一次，他从乐清经谷庄回瓯北，在三条岭上遇到了3个土匪。他一个人就缴了他们3个人的枪，使他们再也不敢在这些地方拦路抢劫了。

1945年2月25日，为了处决岭头

大恶霸潘行浪，关榕和汪吉仁等从闪坑出发，长途奔袭。3月1日夜，他们在梅坦戏场的赌桌旁击毙了潘行浪，为人民除去一害，缴获一支20响驳壳枪。就在这时，关榕突然得知屿北民兵与国民党自卫队发生冲突，他虽几夜未睡，又马上赶到屿北。原来是国民党永嘉县第二自卫队中队长潘善藏带领自卫队30余人来村骚扰，已被民兵打得抱头鼠窜。大家估计这批家伙不会就此甘休，还要再来，于是作了战斗部署，准备迎战。大约8点多钟，果然有100多个自卫队员从屿北村的西、南、东3面冲过来。关榕指挥民兵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傍晚时，自卫队忽然大喊“冲啊”，关榕判断，他们实际上要撤退了，就带领民兵奋勇直追。回师时，还缴了岩坦警察所的21支步枪，加强了民兵的装备。从此以后，顽固派听到“王猛”这个名字，就害怕三分。人们称赞“王猛真是人民队伍的一员虎将”！

同年3月底，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成立，关榕先后担任十一中队和九中队的指导员和中队长。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4月和8月，先后派遣三十三师师长周淘漉和浙保第二纵队司令裘时杰为指挥官，向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清剿”。面对数倍于己的顽军，中共瓯北中心县委和总队部决定，以分散对集中，避开正面作战，保存军队有生力量，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关榕及所属中队在瓯北中心县委书记兼永乐总队政委胡景琥的率领下，进入仙居、黄岩、缙云、青田等县境活动，后在新垅、小前山、望远头袭击敌人，取得数次胜利。关榕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榕无私无畏，为了党的事业，他总是冲锋在前，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1946年2月，关榕、李振华、潘田波根据群众的要求，带领武工队去金平村抓恶霸金天锡。22日夜，他们抓住一人，仔细辨认后发现是金天锡的弟弟，就放了他。他们刚要走，从暗室中射来一梭子弹，李振华、潘田波被打伤。关榕知金天锡有准备，立即下令撤退。退到20里路外，伤员因失血过多想喝水。关榕说，不能喝生水，这里的人家他熟悉，他去山上要点水来。他走到半山腰，正与追击的敌人相遇。关榕为掩护战友，向队伍集结地的相反方向飞跑，并不时举枪射击敌人，同敌人周旋了几十分钟。

他左脚被打伤，枪弹也打完了，他就砸毁驳壳枪，拿起石头与敌人拼搏。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

1946年3月，关榕被押解到温州第四监狱。中共浙南特委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营救，均无效。在狱中，敌人使尽了花招，用遍了刑具，都未能从关榕口中得到一点党的机密。关榕的伤口糜烂，生了蛆，但敌人仍不给医治，想以肉体上的折磨来消磨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意志。后来，关榕被打伤的一段小腿骨竟烂断了，他强忍着剧痛，没有流过一滴泪，没有叫过一声痛。

一个叛徒对关榕劝降，装着关怀体贴的样子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犯不着把自己的性命丢掉。关榕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的谬论，说：“自古以来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好汉！”他作为共产党员，决心为国家、为革命献身，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据同监的难友汪瑞亭回忆说，无论怎样使用酷刑，关榕从不叫一声苦，不叫一声痛。他对我们说：“对敌斗争，要坚决，要硬！我们共产党员，为人民革命，是不怕死的。”

关榕被害时年仅22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那为公忘私、为国忘家的奉献精神和铁骨铮铮的革命气节，将永远铭刻在浙南人民的心里。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接80页文末）

者是无法杀尽灭绝一样，革命书籍也是禁止不了的，越是查禁，人们越是要将它扩散，以教育群众。《再华文拾》最终还是被带到上海、广州等地分送和发售，连暂存鳌江公学的一部分书也被当地青年陆续取去阅读。陈再华的诗文和业绩，激励无数青年追寻着他的足迹走上了革命道路。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陈宜中

陈宜中（？—1282后数年），字与权，南宋永嘉（今龙湾区）人。早岁家贫，而品貌英俊，富贾器之，以为当大贵，遂妻以女。既入太学，文誉甚著，宋宝祐四年（1256），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权倖，擢为殿中侍御史，谋夺董槐相位。宜中和同学刘黻等六人上书参劾，大全怒，使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去学籍，谪建昌军。司业率太学十二斋生冠带送行，号称“六君子”。景定三年（1262），丁大全被逐，诏免陈宜中等六人省试，令赴廷试，宜中高中榜眼，由绍兴府推官历任户部架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子监祭酒。咸淳三年（1267）正月，以进读《中庸》赐紫章服，旋迁监察御史。程元凤再相，宜中首劾元凤纵丁大全肆恶，并自请外任，出为江东提举茶盐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为祟政殿说书。六年二月经筵进讲《春秋》终篇，赐象简金御仙花带鞍马，旋升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七年四月再乞补外，以显文阁待制出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在任深得民心。八年八月，以“克举厥职”，升宝谟阁待制，十月兼给事中。九年为刑部尚书兼给事中，六月上言樊城之溃，牛富死节最著，应加赠以顺舆情；范文虎不力援襄阳，应严正处罚。九月同签书枢密院事。十年十月拜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德祐元年（1275）正月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二月贾似道丧师芜湖，宜中升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请诛似道。三月，设计杀似道死党殿前指挥使韩震，迁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并都督诸路军马。六月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七月张世杰等兵败焦山，原左相王爚



之子嗾使太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诸如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谗阻挠；贾似道丧师误国，明罚暗佑；张世杰步兵用于水战，刘师勇水兵用于步战等等。书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来，罢王爚官、下刘九皋于狱仍不至，太皇太后作书遗宜中母杨氏，始请乞祠入侍。十月方入朝，旋为右丞相，但元兵已经压境，大势已去。宜中仓皇发京城民15岁以上者为兵，遣将救援常州。常州城破，元兵迫独松关，邻邑望风逃遁，遂遣使求和。不许，率群臣入官请迁都，因误期（原定明日而误云即晚）而失信于太皇太后，事不果行。宜中和元丞相伯颜约会谈判，不敢往，当夜逃离临安。二年二月，南宋王朝投降，闰三月，驸马都尉杨镇带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至温州，陆秀夫等人随至，遣人往青澳（洞头县大门岛）召宜中，往定海召张世杰，相率哭于江心寺高宗南奔时之御座下，拥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当即乘舟由温入闽，宜中母死，舁棺舟中。五月初一，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宜中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元兵进抵福建，宜中等奉益王登舟，初至泉州，旋移潮州。景炎二年（1277）十月，元军刘深以舟师攻益王于浅湾，益王走秀山，宜中入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求援。十二月，益王昰至井澳，飓风坏舟，几乎溺死。宜中知兴复无望，遂留占城，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元至元十九年（1282），元军伐占城，宜中逃往暹罗（今泰国），后卒于暹罗。其子芹孙、女尼净戒则于宜中死后回国。宜中为温州历史上最早丞相，其功过得失尚无定评。文天祥、陆秀夫鞠躬尽瘁，视死如归，宜中不如远甚。但秉持危国，终身不降，尚不失民族气节。

（文章来源：《温州市志》）

黄 淮



黄淮（1367—1449），字宗豫，号介庵，明初永嘉城内（今鹿城区）人。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进士，授中书舍人。明成祖朱棣即位，召对称旨，遂与解缙等随侍左右以备顾问，入直文渊阁。永乐元年（1403）秋，升翰林院编修，进侍讲，二年主会试。朝议立太子，淮请立嫡以长。皇太子立，迁左庶子兼侍读。五年进右春坊大学士。次年与胡广、金幼孜、杨荣、杨士奇同受命辅导皇太孙。七年帝北巡，命黄淮和蹇义、金忠、杨士奇四人留守以辅太子监国。八年，帝征战在外，长沙李法良谋反，淮识破汉王朱高煦阴谋，力劝太子遣老将李大彬平叛，得以成功。十一年帝再北巡，淮仍留守以辅太子。十二年帝征瓦剌还朝，太子遣淮等迎候稍迟，汉王高煦乘机诬陷，淮等东宫官属遂下诏狱，囚禁十年，日惟赋诗自遣，引咎责已，著《省愆集》二卷。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即位，淮因“从容调护”有功，立即释放复官，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仍入阁办事，丁母忧，乞终制，不许。洪熙元年（1425）进少保户部尚书兼大学士。仁宗死时，淮和杨士奇在危难中佐郑、襄二王监国，候太子来京，因忧危而吐血。宣德元年（1426），宣宗朱瞻基亲征朱高煦，命淮留守以佐二王监国。次年八月因病致仕，家居温州黄府巷二十余年。淮父性，年九十卒，诏赐葬祭，诣阙谢恩，恰值灯节，赐游西苑，乘舆登万寿山，命主会试，赐宴太掖池，宣宗亲赋长歌送行，备极人臣之荣。英宗立，再入朝，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卒，享年八十三，谥文简。黄淮历事四朝，功成不恋位。成祖赞其“论事如立高

冈，无远不见”。《明史》本传赞其“性明果，达于治体”。遗著现存者有《介庵集》十一卷。此外，永乐十四年（1416）曾和杨士奇合编《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

（文章来源：《温州市志》）

— 征稿启示 —

尊敬的读者朋友：

《温州史志》期刊始创于1980年，是由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内部刊物。定位为融理论性、学术性、资料性、文学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史志刊物，旨在“服务中心工作，促进学术研究，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地方历史，讲好史志故事”，设有资政参考、党史研究、志鉴交流、史海钩沉、历史人文、革命人物、诗意温州等栏目。

为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现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有关温州地区党史和方志稿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成就、重大事件，温州本地相关历史人物和人文特色等。竭诚欢迎专家学者、史志工作者、重大事件亲历者、史志爱好者踊跃投稿。

稿件要求如下：

1.来稿需为原创性文章，政治立场正确、史实准确、主题鲜明。如已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过，应注明发表情况。

2.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学术规范。如引用他人成果应予注明，引文须出自公开出版的最新版本或权威版本。

3.本刊编辑部有权进行必要删改。如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殊说明。

4.本刊不收取版面费、编校费等任何形式的费用。稿件一经采用，将按相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享有出版权与转载权。

5.来稿请附作者简况，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银行账号，以便邮寄样刊与支付稿酬。

6.来稿每篇字数以3000—6000字为宜，请以word文档形式直接发送至电子邮箱：wzds@zjds.org.cn，邮件标题为《文章题目+作者名字》。联系人，李亮，电话：0577-88968780。

《温州史志》编辑部

2024年9月

张 璁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后因和世宗朱厚熜同音，世宗亲为改名孚敬，赐字茂恭，明永嘉永强（今龙湾区）人。年十三，题诗以卧龙自许。弱冠游乡校，督学使者惊其论议，以为前程不可限量。明弘治十一年（1498）中举人，复七试不第，“筑精舍于姚溪，读书授徒，慨然有治平志”。正德十六年（1521）始登进士，年已47岁。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大臣拥立堂弟朱厚熜为帝。即位后，帝欲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皇考，朝议援汉定陶、宋濮王故事，称明孝宗朱祐樘（武宗之父）为皇考，以朱祐杭为兴献帝，世宗不乐，议三上三却。璁时在部观政，七月初一上疏，认为“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和“今武宗无嗣”迎立“兴献王长子”，情况不同，前者属于继嗣，后者属于继统，因此力主尊本生父为皇考，世宗得疏大喜，但迫于武宗遗诏起草者杨廷和等的反对，未能更议，授璁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同官桂萼上疏申论继统之说，世宗心动，复下廷议。三年正月，璁再上疏斥继嗣说“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于是世宗排除阻挠，诏令璁进京议礼，升二人为翰林学士。继嗣派官员在杨廷和支持下“欲扑杀之”，张璁冒死面折廷臣之非，得到世宗赞同。廷和子杨慎偕翰林学士三十六人以罢退相威胁，均遭斥责停俸，月余，杨慎、王元正等又发动疏谏和撼门大哭，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拘捕为首者，廷杖死者十七人，下狱一百数十人，史称“议大礼”之争。从此张璁深得宠信。四年冬，《大礼集议》成，进詹

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寻进左侍郎。六年，进《大礼要略》，命开馆纂修《明伦大典》，敕掌都察院事。冬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七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七月《明伦大典》成，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八年九月杨一清罢相，遂为首辅。十三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十四年春得疾，屡疏致仕，护送回乡。十八年二月六日卒，享年65岁，谥文忠，封赠太师。遗著有《礼记章句》《大礼要略》《罗山奏疏》《罗山文集》《正先师孔子祀典集议》《金縢辨疑》《杜律训解》《敕谕录》《谕对录》《钦明大狱录》《霏雪编》《嘉靖温州府志》等。张璁从进士到入参政务仅只六年，位居首辅六年，备极宠荣，世所罕见。《明史》本传赞其政绩："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但对其"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亦有微词。告老后在温州兴建府第，原拟"自城闽抵绿野桥（即双莲桥），尽撤民居，将城甃移此地，松台（山）围归私第"，承差问计妙果寺，以"激变之策"弭之，始缩为今三牌坊、大士门，张府基、妆楼下之地。现妙果寺侧尚存有嘉靖御书"孚敬""茂恭"二碑。

（文章来源：《温州市志》）

永嘉学派薛季宣的江心屿诗情

◇ 尤豆豆

二峰高峙夹禅扃，长落潮音逐磬声。
老僧睡起绝无事，不管波涛四面生。

二峰，指东西二屿。禅扃，寺门。磬，寺院召集僧众用的鸣器。诗句写位于江心屿的龙翔寺耸立中川，二峰夹峙，四面波涛，势欲浮动；复以磬声潮音相和鸣和老僧的淡定，化解汹涛拍岸的惊险，从而渲染了结宇孤屿、安禅巨浪的宏壮境界。寥寥数句，即能发露江心寺之胜，堪称好诗。

这首诗出自南宋永嘉人薛季宣的《雨后忆龙翔寺》（七绝二首），为作者宦游在外，忆怀故乡名胜之佳作。薛季宣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他有500多首诗作传世，但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主要创始人，对后世影响深远。

出身名门望族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永嘉梯云坊（今鹿城区大高桥）人。薛季宣是一位“官三代”。祖父薛强立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出仕为官。自薛强立开始，家族中许多成员凭借科举、荫补进入官场。从北宋末年开始，永嘉薛氏成为一个政治参与度较高的家族。



薛强立的四个儿子薛嘉言、薛昌言、薛弼、薛徽言（薛季宣之父）均踏上了仕途，显赫一时。其中，三儿子薛弼官至敷文阁待制，是温州走出的名公巨卿。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赵构避金兵逃难海上，驻跸江心屿。正是薛弼拜见宰相吕颐浩，言“岛岸萧条，无以安上躬，不如跸郡廨，增舟取材，皆有定所，民不加敛，扈从休息”，并“献策：请平其直、鬻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冀
《永乐大典》中的薛季宣记载

产。皆奏从之”。在薛弼的劝说下，宋高宗移驾城区州衙。

这是薛氏家族和江心屿在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交集。绍兴十年（1140），薛季宣6岁，父母相继因病去世，葬于永嘉。幸运的是，伯父薛弼收养了薛季宣，并带着他宦游各地。

薛弼曾任岳飞参谋官，薛季宣喜欢听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英勇事迹。“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飞）韩（世忠）诸将兵间事甚悉”。

10岁时，他与孙汝翼之女订婚。岳父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孙汝翼藏书多，在他处读书时，薛又有机会拜师名士袁溉。袁溉师从程颐之学，薛季宣得其所学。

17岁那年，伯父薛弼在广州逝世。在岳父荆南安抚使孙汝翼的安排下，他任职机宜文字（书写机要文书）。后来，薛季宣又以二伯父薛昌言恩荫入仕，曾任鄂州武昌县令、婺州司理参军，迁大理寺正、湖州知州。

遗憾的是，薛季宣年仅40岁就去世了。

一生短暂绚烂

才华出众，一生短暂而绚烂。薛季宣以学术闻名，开创永嘉事功学派先声。他博通古今，务求实用。在永嘉学派的发展历程中，薛季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以“制度新学”为旗帜，指明了温州区域文化与道学传统分道扬镳的方向，奠定了永嘉学派的理论基石，迎来了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时代。

薛季宣其学“精博为永嘉诸儒之

冠”，著书甚多，可惜很多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学问淹雅，持论明晰，考古详核，立说精确，卓然自成一家”。

薛季宣其学也精，其文也闳。“于诗则颇工七言，极跻厉纵横之致”，《宋诗钞》评论“其诗质直，少风人潇洒之致”。

虽然他自谦“不甚专心于词翰”，但存诗500多首，所著《浪语集》35卷中，诗10卷。后人选本，《宋诗钞》钞录84首，篇数最多，《东瓯诗存》钞录24首。其中《游竹陵善权洞二首》《雨后忆龙翔寺》《春愁诗效玉川子》等诗，为历代选家所重。

薛季宣至少写下了4首关于江心屿的诗歌。

龙翔寺

二江涵古寺，双屿耸平沙。
翠浪环流净，金城到眼奢。
水光摇殿阁，塔景动龙蛇。
不减蓬壶意，屯云未许遮。

雨后忆龙翔寺（七律）

好溪东赴海门秋，中有禅居涌碧流。
潮信往来双别屿，世缘生灭几浮沤。
菱歌面面来渔鼓，灯火层层到客舟。
何事瓜期外留滞，短窗斜雨不堪愁。

从最后两句的“何事瓜期外留滞，短窗斜雨不堪愁”，可知这组同题二作之诗是薛季宣宦游在外，忆怀故乡名胜而作。诗中一半是寂寞乡愁，一半是孤独宦情。人在异乡，一场雨后，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乡名胜：江心孤屿的龙翔寺。

龙翔寺，原名普寂禅院。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赵构在岛上驻跸时，亲自赐名题额。宋代赵鼎在《建炎笔录·建炎四年庚戌岁》中写道：“二月，车驾在温州港。初一日，御舟移泊温州江心寺下，因赐名龙翔寺。有小轩东向，赐名浴日，皆御书题额。”可惜，赵鼎笔下的这些题额均未能留存。



江心寺中的“高宗道场”石碑

怅望千秋，超越兴亡

薛季宣写家乡温州的诗很多，乡情重，韵味长。《雨后忆龙翔寺》（七绝二首），是薛季宣代表作，也是江心屿的品牌诗。

雨后忆龙翔寺（七绝二首）之一

二峰高峙夹禅扃，长落潮音逐磬声。
老僧睡起绝无事，不管波涛四面生。

据本土学者考证，该诗两句佳咏系袭用了唐末五代诗人罗隐咏金山寺的诗句。罗隐有《题金山》之句，诗云：“老僧参罢关门后，不管波涛四面生。”

因为温州江心寺，与润州（今镇江）居长江之中的金山、焦山形势相似，旧有“小金焦”之称，所以薛诗的移用十分恰当，同称写景浑切。唐宋诗词中这类成例甚多，一些名句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运裁和磨莹中“点铁成金”，传诵千古。这正如明代诗论家杨慎说的“披朝华而启夕秀，有双美而无两伤”。

雨后忆龙翔寺（七绝二首）之二

窣堵东西岌两峰，王宫今日梵王宫。
潮船八面来勍敌，都入禅师燕坐中。

这首诗摄动静于一篇之中，人事、自然之“动”，终纳入禅师静坐。诗人用以静制动的方式暗示：历史与自然的潮起潮落，无一例外终归于寂灭。

薛季宣的历史信仰既有“通古今之变”的功利性，又有“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这种情怀不以功利性的历史殷鉴意识为特色，相反更多俯览历代兴亡、超越是非评判的历史寂灭之思。

才情卓越，题材丰富

薛季宣诗歌的择题亦独具眼光，不同凡俗。梁祝故事传说已久，而士大夫之流罕见涉笔。《浪语集》卷收录有《游竹陵善权洞二首》，为游宜兴祝英台故宅所赋，被称“咏梁祝第一诗”。

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
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
蝶舞疑山魄，花开想玉颜。
几如禅观适，游鲔戏澄湾。

戏曲家钱南扬认为这是最早提到“化蝶事”的文献，可见其意义。

为岳飞冤屈伸张正义之作，薛季宣的《周将军庙观岳侯石像二首》恐怕也是最早的一首。

万死何知狱吏尊，威名盖代古难存。

二桃岂为功高赐，一舸不容身退论。
几为饮江思道济，缪因图像削王敦。
沉碑千古蛟川恨，留与无穷客断魂。

周将军庙位于江苏宜兴，岳飞曾在这里平息贼寇。为了感激岳飞，当地人将岳飞的形象摹刻于石，供奉在周将军庙。后来岳飞遇害，当地人不忍破坏石像，将其沉入溪水中保存。

薛季宣素来钦佩岳飞，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写的《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中说："恭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他还进言应予岳飞彻底平反，返其田宅，以礼归葬，恩泽子孙。

薛季宣还有一首萌萌哒的小诗《乳猫》。

乳猫毛比雪，卉服絮成衣。
扼鼠气方盛，食牛形但微。
纷拏殊矍铄，上下拟腾飞。
几许明眸子，亏盈望日晖。

小奶猫抓到老鼠时的神气，上下扑腾的可爱，水汪汪的大眼睛，被薛季宣描绘得活灵活现。可曾想，这位南宋大儒在生活中也是一位真性情的"猫奴"。

"好文近乎儒！"从薛季宣的身上可以看到，永嘉学派是个德艺兼成的学者群体，精确之学与闳肆之文并重，既有才华又有魅力。

孤屿不语，世事悠悠！

（作者单位：潮新闻 共享联盟·温州中心）

“强城行动”大事记（第三季度）

◇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7月1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五城三园”（海上花园）建设工作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出席会议。张振丰指出，要提升“经略海洋”的格局站位，把握打造新增长点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正建设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张振丰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真正把洞头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殷殷嘱托，聚力打造浙江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全面提高发展承载力、开放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为温州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极作出更大贡献。

7月7日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专题调研“五城三园”（瓯江新城）建设工作 张振丰先后来到CBD云谷商务大厦、润滨大厦项目工地，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建设招商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指出，CBD是瓯江新城建设的核心板块、引领“五城三园”的中枢龙头、城市发展的关键引擎。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整合资源、集聚力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瓯江新城CBD建设，全力塑造国际范与温州味相融、时尚感与文化韵并蓄的城市新封面。

7月9日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专题调研“五城三园”（西部时尚城）建设工作 张振丰先后来到鹿城区双屿街道、中国鞋都·环球商贸港，察看西部时尚城核心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走访商户。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指出，西部时尚城是传统支柱产业转型的核心支撑、冲刺“双万”城市的重要动能、打造“世界的温州”

的强力引擎。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把握前瞻发展趋势，强化“时尚定义城市”的理念认识，以科技创新赋能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联动、高质高效推进西部时尚城建设，全力打造“中国时尚产业之都”的重要窗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要求，要坚持内涵发展，把握时尚潮流趋势，加快产业提升、城市蝶变，着力构建时尚高地。要坚持规划引领，锚定目标定位，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区域发展整体跃升。要坚持项目为王，完善推进体系，强化工作合力，确保快出成效、早见形象。

7月17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五城三园”（生态园）建设工作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倍加珍惜、持续擦亮温州生态园这张“金名片”，立足历史长河、城市格局谋划保护提升，努力将其打造成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标本、山水相连“城市绿心”和大都市生态会客厅、“产城人园”共生共融的高质量发展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要求，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生态肌理。要坚持系统规划，把资源优势转化好。要坚持内涵发展，做好环境、产业形态管控。要坚持专业经营，体系化、市场化打造文旅产品。要坚持立足当下，完善交通动线，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坚持高效管理，制度化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8月12日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专题调研“强城行动”（龙平苍一体化）推进工作 张振丰先后来到苍南县江南再生水厂、瑞苍高速公路项目龙港段施工现场、平阳县鳌江国际新城，详细了解工艺流程，服务覆盖范围，龙平苍交通总体规划、项目进展等情况，察看项目建设进展。他要求建设运营方坚持“产城人”深度融合，充分发挥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强城行动”，对标打造“大都市区南部副中心”的功能定位，坚定不移推进龙平苍一体化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携手打造跨区域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

8月24日 温州西部时尚城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2024温州国际时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会上，我市发布《温州打造中国时尚产业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活动

中发布2023中国皮革行业消费引领品牌、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等榜单，与会领导和嘉宾为上榜的17家温州企业授牌。市政府与北京服装学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备忘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表示，温州将以“强城行动”为牵引，以西部时尚城为主阵地，强化生态赋能、设计赋能、品牌赋能，提速打造中国时尚产业之都，催生时尚产业新质生产力，期待更多企业家、专家学者和人才精英一起“来温州创未来”。

9月11日 全市“强城行动”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副省长、市委书记张振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温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优化、工业产业空间布局、温州龙湾机场三期扩建等情况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会议要求，要科学谋划、加快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支撑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构建内畅外联、快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持续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强保障力度，拓展发展空间，增强企业信心，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要打造空铁一体化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加大龙湾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推进力度，优化内部空间、结构布局和交通网络，持续提升城市辐射力和影响力。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聚力“续写创新史、再创新辉煌，提速打造‘全省第三极’”，深入实施“强城行动”，加强规划顶层设计，谋深谋细落实举措，以更高水平规划推动温州高质量发展，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整理：王仲祥、高梦遥）